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七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五年九月

明代江西衛所的屯田

于志嘉*

前人研究明代軍屯，認爲弘治年間全國各地軍屯普遍荒廢了明初總額的一半，要到萬曆清丈才又恢復明初原額。萬曆《大明會典》所載江西軍屯原額大於現額，究竟會典中所謂的原額與現額代表的是哪一個時代的數額？江西軍屯的發展與其他地區有何相異之處？本文參照《萬曆會計錄》、《江西賦役全書》及多種方志資料中的相關記事，嘗試就上述問題提出解答。並且指出弘治十六年江西軍屯的清丈，是爾後江西軍屯益趨敗壞的關鍵。清丈後添設的「新增」一項，深化了軍民衝突。而「軍屯民佃」的趨勢，也使得軍民之間不可避免的產生許多互動關係。隆慶以後，由於虛糧擾民，地方官開始積極介入衛所事務。萬曆以後，更多的軍屯改革經由地方官之手被推動。另一方面，由於江西衛所的屯田肩負了幫貼漕運的任務，爲使漕運工作能順利推行，上級文官的態度有時就不能和站在第一線面對群眾的縣官一致。本文以實例說明衛所與州縣、上級文官與基層地方官間的對立與互動。對萬曆間江西衛所屯糧供軍比例及其與官軍俸糧額數間的關係亦有闡述。

關鍵詞：明代 江西 衛所 軍屯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于志嘉

一、前言

筆者研究明代軍戶多年，一貫主張將軍戶區分爲「衛所軍戶」、「原籍軍戶」與「寄籍軍戶」三部分來討論。然而受到既有資料的限制，過去發表的論文多爲有關「原籍軍戶」的部份。[1]「寄籍軍戶」僅在一篇討論「幫丁」的文字中約略介紹過其概念，[2] 這部份因爲資料的收集特別困難，尚有待進一步的努力。至於「衛所軍戶」的部分，由於明代各地區衛所之功能不盡相同，實有分區域進行研究的必要。十年前筆者就曾嘗試從方志資料入手，針對某一地區進行研究，可是當時乾隆以前明清方志的查閱頗爲不易，以致有關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廢。近年來各種方志叢書的大量出版使區域研究的環境大爲改善，筆者乃重新出發，以江西地區作爲個人展開區域史研究的第一步。

江西地居腹裡，就軍事地位而言，在明代並無特別重要之處。江西地區衛所在軍事上的功能，自然也無法與沿邊或沿海地區衛所相提並論。然而，選擇江西地區作爲研究的對象，除了方志資料容易取得的優勢外，江西衛所參與漕運以致入清以後仍有不少相關記事殘留也是原因之一。筆者注意軍戶問題，尤其留心軍役內容的演變，認爲是影響衛軍功能的重大因素；對所謂「衛所軍戶」的研究，主要目的也就在探討衛所軍役的變化，期能藉以釐清衛所的功能。就此點而言，腹裡衛所的研究同樣有其重要性，甚至還有可能透過對腹裡衛所的瞭解，修正過去通論性研究中因偏重沿邊沿海地區發展而引發的許多以偏蓋全的說法。不過，在目前有關明代衛所或地方兵制的基礎研究都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要以區域研究的方式作細部分析實有其困難。筆者乃先就明代江西地方兵

---

[1] 于志嘉，〈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4（1986）：635-67；〈再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户——幾個個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1993）：639-78。另外，于志嘉，〈試論明代衛軍原籍與衛所分配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2（1989）：367-450；〈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户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135-74，討論的則是原籍軍户與衛所軍户間的關係，唯後者偏重於衛所軍户。

[2] 于志嘉，〈幫丁をめぐって——明代の軍户において——〉，《西嶋定生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東アジア史の展開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印刷中）。

制的演變加以討論，[3] 再以之爲基礎，探討江西衛所軍役的變化。又因爲軍屯是江西軍役中重要的一環，因此從江西衛所的屯田開始討論，以作爲相關研究之楔子。[4]

二、明代江西衛所屯田數額的檢討

明代江西軍屯肇始於洪武，至永樂而大備。[5] 各衛所的軍屯數額散見於各書，但彼此間歧異頗大，有時不能以時代差異來解釋。關於明代軍屯數額的問題，前輩學者如清水泰次、梁方仲、王毓銓等均作過或多或少的討論，近年來顧誠、張德信、林金樹等也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考察。[6] 唯所依據的史料包括正

---

[3] 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4（1995）：995-1074。

[4] 相對於明代軍制史研究的其他課題，有關軍屯的研究一向是比較熱門的。這是因爲明代軍屯所佔土地相當廣闊，軍屯研究常被視爲土地制度史研究的一環，受到社會經濟史家的重視。有關明代軍屯的區域性研究也是軍制史相關領域中最有成果的，但研究區域偏重遼東、河西、雲南等實土衛所地區，腹裡衛所的研究相當缺乏。1989年以前的研究狀況可參考于志嘉，〈明代軍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2），528-31。

[5] 江西各衛所軍屯設置時間詳見本節的討論，顯然永樂二年是重要關鍵。松本隆晴，〈明代屯田子粒統計の再吟味——永樂年間を中心にして〉，《史滴》3（1982）：51，討論實錄中自洪武以來有關屯田子粒的統計，認爲明初的屯田子粒之所以由洪武二十一年的五百萬石躍升至永樂初年的二千三百萬石，完全是因爲洪武三十五年屯田科則的改變所致，否定了過去認爲在洪武末永樂初因屯田規模擴大、生產力上昇，導致屯田子粒激增的說法。松本的說法顯然未能考慮到各地區實際的發展，例如江西地區的衛所在洪武二十一年時尚未設置完成（于志嘉 1995），江西軍屯的全面推展是在永樂二年以後。松本的錯誤也進一步證明了區域研究的重要及其必要性。

[6] 參見清水泰次，〈明代の軍屯〉，《東亞經濟研究》8.2（1924），收入《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大安，1968），本文所引頁碼爲《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之頁碼；梁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顧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4（1986）：193-213；張德信、林金樹，〈明初軍屯數額的歷史考察——與顧誠同志商榷〉，《中國社會科學》5（1987）：187-206。

德及萬曆版的《大明會典》、《明實錄》、《明史》、傅維鱗《明書》、王鴻緒《明史稿》、王圻《續文獻通考》、茅元儀《武備志》及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等，其詳略雖互見，但最詳細的也不過止於各都司總數原額與現額之陳述，對都司所屬各衛所的細數則均未能提及。本文因此藉助《萬曆會計錄》、萬曆《江西省大志》及《江西賦役全書》等資料，再配合會典及各種方志的相關記述，期能對江西地區各衛所屯田數額作一檢討。

明代江西軍屯的原額，據萬曆《大明會典》卷十八，〈戶部五・屯田〉、《萬曆會計錄》卷三十八，〈屯田〉、茅元儀《武備志》卷一三五，〈軍資乘・屯田今制〉、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五，〈田賦五〉皆作5623頃41畝2分5釐。現額屯地則不論各書編成年代爲何，眾口一詞，都是5471頃38畝4分3釐，僅《續文獻通考》註明其爲「嘉靖中額」。現額子粒數《萬曆會計錄》作101546石4斗2升5合，會典誤植爲21546石4斗2升5合，《武備志》、《續文獻通考》皆沿襲其誤。

關於會典所謂原額與現額所代表的時代問題，清水泰次認爲原額應指永樂以後數額，現額則爲嘉靖四十一年清查數。理由是諸數據中有「在京錦衣等五十四衛幷後軍都督府」一條，在京錦衣衛既不存在於洪武朝，相關數據自應爲永樂以後。而該條於現額屯田數後既已清楚註明爲「嘉靖四十一年清查數」，則其他各條亦應準此而爲嘉靖四十一年的數據。[7] 推想欽定《續文獻通考》將萬曆會典所載現額明記爲「嘉靖中額」，也是基於同樣的想法。梁方仲亦認爲原額是指永樂以後額數，但對所謂現額則認爲是「萬曆初年查報冊數」，僅承認「在京錦衣等五十四衛幷後軍都督府」一條爲「嘉靖四十一年清查數」，顯然他也注意到了這條史料，但不認爲可以之概括於所有地區。[8] 王毓銓則懷疑「在京錦衣等五十四衛幷後軍都督府」以外各條爲萬曆九年清丈以後的現額數字，但也不排除有可能是抄襲了萬曆六年的《會計錄》。至於原額，王氏認爲應是弘治會典修纂時各處屯田的現在總額，「也就是弘治十五年的見額，或臨近弘治十五年時的數額」。他並且修正弘治初修會典時全國屯田總額爲28萬餘頃，認

[7] 清水泰次，〈明代の軍屯〉，262-67。

[8] 梁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364。

爲明初屯地總額應接近萬曆間的63萬餘頃。[9]

王毓銓所稱弘治間所修會典，後於正德間刊行，是爲正德《大明會典》。但正德會典所載，是否就是弘治末年的數據？仍不無疑問。如顧誠即認爲：[10]

> 正德《大明會典》記載的“各處屯田總數”資料來源很值得懷疑。它們既不是洪武年間的原額，也不是弘治、正德年間的實有屯額。

王氏自己亦曾指出，弘治年間全國軍屯總額大體維持在29萬頃上下，「估計爲明初全國屯地總額的一半」，已是對明初總額的「最低估計的最低限度」。換言之，他認爲弘治間各地屯地普遍荒廢了明初總額的一半以上，至萬曆清丈才又恢復明初原額。他以四川、遼東爲例，肯定正德會典所載爲弘治間數據，但由上舉江西的數字來看，正德會典的數額甚至大於萬曆會典的現額。是江西地區軍屯發展情況特殊？還是史料中的數據另有所指？顯然仍有討論的餘地。以下即將《萬曆會計錄》等三書中的相關數據分別列表於下，以資比較。

附表1：萬曆十年《萬曆會計錄》所載江西各衛所屯田子粒額數表

衛所名	屯田地	糧	衛所名	屯田地	糧
南昌衛	160696.055畝	29146.0474石	袁州衛	25017.860畝	4997.7120石
贛州衛	117420.000畝	19934.4682石	吉安所	11206.574畝	2241.3148石
安福所	13171.680畝	3416.0000石	永新所	12889.230畝	3582.0000石
撫州所	39565.540畝	6688.8934石	建昌所	11647.500畝	2462.4490石
廣信所	22692.691畝	4407.8382石	鉛山所	24420.000畝	4884.0000石
饒州所	31032.000畝	5749.1670石	南安所	25800.000畝	4190.2649石
會昌所	22790.000畝	4558.0000石	信豐所	26910.000畝	4911.7350石
龍泉所[11]	1879.300畝	384.3350石	合計	547138.430畝	101546.4250石

*資料來源：《萬曆會計錄・屯田》38：44b-46b。

[9]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98-113。

[10] 顧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209-10。

[11] 《萬曆會計錄・屯田》38：46b作「龍泉守禦千户所」，應爲百户所之誤，見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997-98。

附表2：萬曆二十五年《江西省大志》所載江西各衛所屯田子粒額數表

南昌衛	原額幷丈增屯田1504頃68.836畝		該子粒正米23626.629石	折銀441.042兩	麥豆折銀578.476兩	屯種軍舍4194名
袁州衛	原額屯田273頃	該子粒正米4740石	新增田13頃55畝	該折色米257.712石	折銀52.122兩	屯種軍舍790名
贛州衛	原額屯田815頃55.05畝	該子粒正米16310.01石	新增田181頃21.29畝	該子粒正米3624.458石		屯種軍舍2765名
吉安所	原額屯田112頃29.81畝	該子粒正米2157.884石	新增田5頃66.53畝	該折色米83.424石	折銀16.686兩	屯種軍舍314名
安福所	原額屯田127頃77.6畝	該子粒正米3318石	新增餘糧田3頃94.08畝	該折色米98石	折銀19.6兩	屯種軍舍550名
永新所	原額屯田126頃63.535畝	該子粒正米3519石	新增田2頃26.695畝	該折色米63石	折銀12.6兩	屯種軍舍597名
會昌所	原額屯田143頃50畝	該子粒正米4785.9石	新增田84頃40畝	該子粒正米1684石		屯種軍舍761名
信豐所	原額屯田203頃40畝	該子粒正米4275.4石	新增田64頃20畝	折米813.73石	折銀162.747兩	屯種軍舍678名
南安所	原額屯田158頃70畝	該子粒正米3174石	新增田93頃30畝	該折色米1016.17石	折銀203.252兩	屯種軍舍553名
饒州所	原額屯田191頃26.265畝	該子粒正米4692.648石	新增田75頃36.51畝	該折色米1056.519石	折銀211.303兩	屯種軍舍800名
撫州所	原額幷新增屯田共390頃15.22畝	該子粒正米5478.974石			折銀1950.043兩	
建昌所	原額屯田75頃15畝	該子粒正米1806石	新增餘糧田13頃75畝	該子粒正米227.425石	折銀45.485兩	屯種軍舍356名
廣信所	原額屯田207頃60畝	該子粒正米4152石	新增田19頃38.441畝	該子粒正米252.724石	陞科餘糧折銀0.622兩	屯種軍舍756名

鉛山所	原額屯田219頃	該子粒正米4380石	新增田25頃20畝	折色米504石	折銀100.8兩	屯種軍舍730名

*資料來源：萬曆《江西省大志・實書》5：1b-5a。

**附表中各數取至小數點以下三位。九江衛因不屬江西都司，數字從缺。另外，建昌所項下尚有「廣昌縣民種二十七頃四十七畝五分，該子粒正米四百二十九石二升四合，該縣徑【逕】自徵解。」其意義將於下文詳細討論。

附表3：萬曆三十九年《江西賦役全書》所載江西各衛所屯田子粒額數表

衛所	屯糧子粒米	折銀	餘糧、新增、其他
南昌衛	實23914.958石（24002.957石）	9565.983兩	
袁州衛	4740石（本色米2370石，該銀948兩，又折色米銀948兩）	948兩	◎餘糧銀52.122兩
安福、永新二所	共6817石（安福3318石、永新3519石）	共2382.9兩（安福1327.2兩、永新1055.7兩）	
撫州所	約計5858.401石	2353.216兩	
廣信所	◎正耗米4536.865石	◎1814.746兩	◎陞科輕齎銀0.622兩
鉛山所	◎正耗米4445.7石	◎1778.28兩	◎新增折銀100.8兩
饒州所	約計2801.099石	1126.039兩（1010.943兩，幷餘糧在內爲1126.039兩）	◎外建德縣民佃本所屯田該子粒米2491.581石，該銀1001.032兩
贛州衛	◎15913.877石	◎6365.055兩	
會昌所	4740.32石（4785.9石）	◎1896.128兩	
信豐所	◎4277.8石	◎1711.12兩	◎外餘糧折銀162.747兩
吉安所	◎2265.774石	◎906.309兩	
建昌所		893.893兩	又外增公費徭銀88.5兩

南安所	3269.22石	1307.688兩	又輕齎餘糧扣用外，餘銀180.753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省總・屯糧〉61a-62a。

**各〈府總〉或各縣之數字與〈省總〉所列不同者，以（ ）示之於後。數字相符者以◎示之於前。參照〈南昌府總〉32a、〈袁州府總〉6b-7a、〈吉安府總〉27a-b、〈廣信府總〉23a-b、〈贛州府總〉25b、〈饒州府總〉27b-28a、〈會昌縣〉11b。南安、建昌、撫州三府《江西賦役全書》不錄，疑爲現存本不全所致。

在檢討三表中所載數據的時代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其資料來源的性質加以釐清。正巧先學何炳棣氏在《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一書中對上舉三書的利用價值皆有所評價，本文亦附其說於後以供參考。

首先是《萬曆會計錄》。是書刊行於萬曆九年底十年初，據首卷所收戶部尚書張學顏的題本，該書乃是「於前書恭進（萬曆九年四月二十日）之後，恐有遺缺差訛，復將本部新題事例、各省直續報文冊，督率司屬郎中等官曹樓等再行檢閱，重加磨算，訂其未確，增其未備」而成的。由於刊行之日正值萬曆九年大規模清丈如火如荼進行之際，張學顏的題本也特別說明了「除清丈田糧候各省直奏報通完之日，另爲一書，續輯刊布外，所據刻完萬曆會計錄」。[12] 由此推斷，是書所載似應爲萬曆清丈前的最新數字。賴建誠以爲此書所記載的數據，「大多是萬曆六年的資料，但由於國土龐雜，某些地方是用其他年份的資料」，如卷五的福建就是用「萬曆八年清丈田糧數」。[13] 唯何氏則有不同的看法。何氏論該書「對明初數字十分尊重不敢改正」，但並未就此點作進一步的說明。[14]

---

[12] 《萬曆會計錄》1：又8b-又又8a。

[13] 賴建誠，〈《萬曆會計錄》初探〉，《漢學研究》12.2（1994）：137-56。

[14]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124。爲瞭解《萬曆會計錄》的數字究竟是何時的數字，筆者曾翻閱張海瀛，《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一書所附《山西丈地簡明文冊》，785-94

其次是萬曆《江西省大志》。《江西省大志》原爲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間王宗沐任江西提學副使至右布政使期間所纂，一稱《七書》。萬曆間經巡撫陸萬垓增修後刊行，現存通行本爲萬曆二十五年刊增修本。由於書中收有萬曆二十四年的記事，有關屯田數額的記載又分列原額、新增兩項，很容易被期待爲萬曆清丈以後的數字。但在以此書與其他方志資料比對後，問題似乎也最大。何氏認爲該書「板刻印刷甚好，但賦役方面只有流水式的表格，沒有絲毫制度淵源及內涵的討論」，實爲確論。[15]

《江西賦役全書》刊布於萬曆三十九年，所收均爲當時確數。由於距離萬曆清丈已近20年，數據較甫清丈後的數額可能已有若干變化。不過，最大的變化還是在子粒米數後記載的「折銀不等，併餘糧各項，共銀」34635兩4錢6分6厘9毫，顯示在萬曆中期江西屯米已由最初僅新增部份折銀，改爲全面改折納銀。何氏對晚明及清代《賦役全書》的評價很高，認爲是整個明清賦役制度中最重要的材料，其數據具有官方權威性。[16] 但由附表3所示〈省總〉與各府縣總間之若干差異可知，《賦役全書》的數據也未必完全精確，不過因爲差額甚小，對大局的影響有限。

瞭解了以上三書的性質，再來比較三表間各項數字的關係，可以看出其中存

中有關山西都司萬曆清丈前後的記錄，發現就山西一地而言，《萬曆會計錄》的數字絕非明初數字，事實上是相當接近萬曆九年的現額的。《山西丈地簡明文册》中所列數字，包括地與糧，其中有關屯牧地額的部份簡略如下：a.「嘉靖三十八年原額」36126頃91畝2分、b. 節年失額地（開除）9884頃90畝8分、c. 節年新增地（新增）6366頃42畝4分、d. 萬曆六年丈出地1258頃41畝9分、e. 萬曆九年實在地33866頃84畝9分等項，各數字間的關係爲：a－b＋c＋d＝e。《萬曆會計錄》所載山西都司屯田原額爲12963頃8畝，山西鎮現額爲33714頃88畝7分。何氏此說或仍有商榷餘地。

[15]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99。何氏記其所見爲嘉靖三十五(1556)年版的《江西省大志》，筆者未見。但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26：1a記有是書撰寫緣起云：「先是，嘉靖丙辰(1556)，其被命督江西學政，再按列郡。講業之暇，頗採其俗產山川賦役，大都時札。留篋中三年，移參藩政。間取讀之（下略）」。嘉靖三十五年似爲是書始撰之年，但最快要到嘉靖三十八年才刊行。何氏對所依據之版本未多加著墨，但他的評語基本上是適用於萬曆版的。萬曆版收有萬曆二十四年的記事，如1：49a即是一例。

[16]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74-75。

在了不少問題。例如，以表1與表2相較，如果張學顏之言爲可信，表1確爲萬曆清丈前的數字，而表2代表的是萬曆清丈後的數字，則以萬曆清丈的效率，讀者一般傾向於預期表2的數字應大於表1。而實際上表2中絕大多數衛所的原額籽粒正米與新增折色米之和等於表1，撫州所的原額新增和甚至小於表1清丈前的糧額。從屯田頃畝數來看，表2的原額與新增和較表1的屯田地額不增反減的衛所更有七個之多。[17] 又如果附表2所謂的原額爲洪、永間的原額，新增是萬曆九年以後的新增，則明代江西衛所屯田在萬曆清丈前的數額已超出原額甚多，這種現象是否符合該地區實際的發展狀況也有待商榷。按：潘季馴《督撫江西奏疏》卷二，〈報丈勘各衛所屯田疏〉有云：

> 該本道查得：江西衛所屯田坐落本省各府屬縣及直隸東流、建德貳縣地方。洪武、永樂年間撥軍下屯開墾。每軍領種壹分，每分參拾畝，歲納子粒米陸石。弘治拾陸年，奉欽差科道親臨丈量，額外多餘者作爲新增餘田，陞納輕齎折銀，遞年照數催徵，給作官軍糧餉。大約田有定區，人有定畝，糧有定則，册有定籍。失額者千無貳參，拖欠者石不升合。（中略）本省屯田，軍民錯雜，山灣水曲，峻嶺斜坡。大段不過數畝，即間納糧民田。如贛州壹衛田地，坐落興國等陸縣，散落四郊，不在壹區。總括乘除之法，較之邊壤，勢自懸殊。非但畫圖不易，抑亦丈量爲難。呈乞俯念南北異宜，移文轉達，止遵數陳末議，後案册報。及經督委各府清軍同

[17] 將附表1之屯田地數設爲x，屯糧數設爲y，附表2之原額屯田設爲a、新增田設爲b、原額子粒正米設爲c、新增米設爲d，比較x與a+b、y與c+d的關係，可列表如下：
南昌衛：x＞a+b、y？c+d　袁州衛：x＜a+b（經修正後，x約等於a+b，參見下文）、y=c+d　贛州衛：x＞a+b、y=c+d　吉安所：x＜a+b、y=c+d　安福所：x=a+b、y=c+d　永新所：x=a+b、y=c+d　會昌所：x=a+b、y＜c+d　信豐所：x＞a+b、y＜c+d　南安所：x＞a+b、y=c+d　饒州所：x＞a+b、y=c+d　撫州所：x＞a+b、y＞c+d　建昌所：x＞a+b、y=c+d+e　廣信所：x＜a+b、y=c+d+f　鉛山所：x=a+b、y=c+d　（e爲廣昌縣民種田所收子粒米、f爲陞科餘糧折銀）　由上可知，除南昌衛難以比較，撫州所爲y＞c+d外，其餘各衛所都是y=c+d或y＜c+d，即清出之屯糧額等於或大於清丈前。相較於此，x＞a+b的衛所有7個之多，顯示清丈後的田畝數字有許多反少於清丈前。

> 知南昌府顧其志、袁州府林萬韶、吉安府戴桂、撫州府徐楠、建昌府錢捧盈、廣信府林敬冕、饒州府蔣建、南安府康誥、贛州府李梧，督同各該衛所掌印管屯官，弔取食糧屯田册籍，親臨地方，將各原額官軍幷田地頃畝額數，逐一清勘明白，重覆逐段丈勘。得江西都司所屬南昌等參衛，幷吉安等拾壹千户所，及額撥守禦龍泉百户所各原額幷新增田地，通共伍千肆百柒拾壹頃參拾捌畝肆分參釐，該納子粒米麥壹拾萬壹千伍百肆拾陸石肆斗貳升伍合伍抄陸撮玖圭。原額、新增俱存，糧石歲徵無欠。合將丈勘過各衛所原額、新增及坐落地方屯田頃畝總散各數，幷見今承種軍舍姓名，造册繳報。

即指出明代江西屯田在弘治十六年曾有過一次大規模的清丈。當時由欽差科道親臨丈量，將「額外多餘者作爲新增餘田，陞納輕齎折銀」。其後因「失額者千無貳參，拖欠者石不升合」，故此在萬曆初潘季馴奉命重勘時，[18] 「原額、新增俱存，糧石歲徵無欠」。值得玩味的是，潘疏以弘治清丈以後「額外多餘者作爲新增餘田」，以「原額、新增」兩項作爲重勘時的依據，而疏中所列重勘後江西地方的屯地總數與該納籽粒米麥數，正與附表1萬曆九年清丈以前的數字相同。推而言之，如果弘治清丈以後江西屯田確如潘季馴所云全無失額或拖欠，則附表1的數字（亦即潘疏中的數字）就應該非常接近弘治清丈以後的數字。然則，附表2的原額是否可解釋爲弘治清丈時的原額？新增是否爲弘治清丈後的新增呢？若然，則附表2的原額與新增之和，宜等於附表1的總數減龍泉所之額。不幸的是，附表2的原額與新增之和不但較附表1的總數小，較正德會典所列弘治十五年以前的數字更少。究竟附表2的數字代表的是哪一個時代？以下即以方志資料爲主，一方面考察各衛所置屯時間及各屯所在位置，另一方面對資料中出現的各項數字所代表的意義，也盡可能加以檢討。

首先是九江衛。九江衛因不屬江西都司，各表均缺乏相關數字。康熙《九江府志》卷十五，〈藝文〉，文德翼〈太守江公蠲免兩衛屯糧碑記〉云：

> 九江之有三衛屯也，自明洪武昉也。是郡元季爲徐壽輝、陳友諒所據以爲都

[18] 據《明史・潘季馴傳》223：5870，潘季馴任江西巡撫在萬曆四年至五年間。

> 會，殺其民殆盡，號以紅巾，土人至今稱紅頭軍。一郡止留七户耳。明高皇既滅之，以其地曠，故使戰勝之軍落屯以居。江南衛曰九江，江西衛曰南昌，湖廣衛曰蘄州，各以指揮使、千百户等職官轄之。厥屯皆錯在九江。歷建文至永樂，乃招民以來，軍爲主而民爲客，屯則良而田則楛，勢也。

據此，九江府之有三衛屯，應始於洪武年間。按：九江衛設於洪武二十二年，南昌衛在正德十六(1521)年以前原分爲南昌左衛及前衛，二衛分別設立於洪武八年及十九年。蘄州衛屬湖廣都司，設於洪武十二年。[19] 九江府因受元末戰亂破壞極鉅，明初人口非常稀少。洪武二十二年設衛時，還是調京軍才得以成立的。大約設衛後不久，即開始屯田。由於民戶僅少，膏腴之地盡爲屯軍所佔。又因以九江一衛軍仍不足以盡墾其地，又分與南昌二衛及蘄州衛。蘄州衛不屬江西都司，本文姑不論。南昌二衛軍屯據萬曆《南昌府志》應始於永樂二(1404)年。[20] 不過，不論是九江衛屯或南昌二衛屯，其所分佈的位置，都不限於九江一府。

九江府下計有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五縣。九江衛之屯田除散佈於府下五縣外，還有一部份分佈在南康府星子縣、湖廣黃州府之黃梅縣及南直隸安慶府之宿松縣。九江衛屯田洪武間原約有5800餘分，「當時募軍開墾，多寡悉隨其力，或二三十畝、或五六十畝、或八九十畝。凡一軍所墾，即爲一分」，[21] 總計原額屯田地共1439頃5畝8分，該糧28790.16石。其中水田有1123頃1畝1分，該糧32460.22石，陸地有316頃49畝7分，該糧6329.94石。嘉靖間除崩坍沙壓荒蕪外，現額共1318頃9畝8分餘，該糧26373.965石，其中水田有1090頃27畝2分餘，該糧21805.544石，陸地有227頃82畝6分餘，該麥糧4568.421石。[22]

南昌二衛則其「屯多坐落九江五屬；其在江南（南直隸池州府）之東流、建

---

[19] 江西地方衛所設置的詳細情況參見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本文不再引。蘄州衛設置的時間參照《大明一統志・湖廣布政司・黃州府》61：24a。

[20] 萬曆《南昌府志・封爵類・武職傳》16：40a-b。

[21] 乾隆《德化縣志・建置・軍衛》4：42b、49b、50a。

[22] 嘉靖《九江府志・食貨志・屯田》4：12b-13b。

德，及南康之星子等縣者，不及十分之一」。[23] 乾隆《彭澤縣志》卷四，〈建置志・軍衛〉謂南昌衛屯在彭澤縣及東流、建德二縣者隸南昌衛前屯，在德化、德安、瑞昌及星子縣者隸南昌衛左屯。萬曆《彭澤縣志》則詳記萬曆間彭澤縣下各衛所屯田分佈的位置、屯軍人數及屯種頃畝數等，羅列於下以見其分散之狀。

※南昌前衛

左千戶所屯：坐落二十等都，旗軍舍餘325名，共屯種田地97頃50畝

右千戶所屯：坐落三十等都，旗軍舍餘495名，共屯種田地148頃50畝

中千戶所屯：坐落二十五等都幷磨盤洲，旗軍舍餘400名，共屯種田地120頃

前千戶所屯：坐落第四等都，旗軍舍餘120名，共屯種田地36頃

※九江衛

中左千戶所百戶張英屯：坐落二十等都、寶梁南山等坂，旗軍舍餘78名，共種水田23頃40畝

中左千戶所百戶王清屯：坐落十二都寶梁坂，旗軍舍餘52名，共種陸地15頃60畝

中千戶所百戶劉聚所屯：坐落五都新橋、烏沙、東庄、橫山等坂，旗軍舍餘54名，共種水田16頃30畝

中千戶所百戶喬清所屯：坐落建安鄉南田、觀庄、太平等坂及望夫山，旗軍舍餘71名，共種田21頃30畝

由上可知，彭澤縣境內共有屯田478頃60畝，分屬於二衛六千戶所。[24] 屯田每分平均爲30畝，但九江衛中所劉聚所屯平均爲每分30.185畝。各所屯田常非集中一區，而是散佈於數處。同區內又時有數屯雜處的情形，如二十都同時有南昌前衛左千戶所屯及九江衛中左千戶所百戶張英屯；寶梁坂則並有九江衛中左所百戶張英屯及王清屯等俱是其例。更有甚者，九江府荒地雖多，九江衛屯卻地跨

[23] 乾隆《德化縣志・建置・軍衛》4：41b-42a。

[24] 萬曆《彭澤縣志・食貨志・屯田》3：24a-25b。屯田總數478頃60畝係按各所項下細目合計得出，與原書之487頃50畝略有出入。又，南昌左衛與南昌前衛早在正德十六年已合併爲南昌衛，史文此處稱前衛，乃是因襲正德以前的說法，合併以後當以南昌衛左屯、前屯稱之。

四府（按：宿松在湖口之北；黃梅在宿松之西，德化之北；星子則在德化之南。五縣雖分屬四府，實則彼此相鄰，位置相近）。這種錯綜複雜的情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已不可考，但由當時地方殘破、百廢待舉的情況推測，倒也不無可能是在半無政府的狀態下，自然形成的。只是各屯位置雖然相近，由於所屬行政區域不同，這種分隔的情況勢必會造成管理上的困擾，事實上其後確也帶來不少問題，這在下文還會討論。

南昌二衛屯田共分48處。其中屬左屯者32處，屬前屯者16處。[25] 萬曆《南昌府志》卷十六，〈封爵類・武職傳〉記載各屯名如下：

◎南昌衛左屯

※九江府屯30處（今查止28處）：

陳家灣屯	新市板屯	小口隴屯	庄前隴屯	馬口隴屯
鬼田阪屯	藕城墩屯	泗溪阪貳屯	青竹坂屯	查埠塘屯
大禾坂屯	倖枋坂貳屯	高塘坂屯	大湖坂屯	南庄坂屯
石門坂屯	白楊墩屯	鄒家埠屯	易家隴屯	城門山屯
洞雷觀屯	荆陂坂屯	書院坂屯	堯家坂屯	常溪山屯
桑落洲屯				

※南康府屯2處：

西山舖屯　　章平坂屯

◎南昌衛前屯

※九江府屯14處：

楊子橋貳屯	楊樹灣貳屯	定山參屯	烏山貳屯	柏山貳屯
會田屯	陶宅屯	磨盤洲屯		

※池州府屯2處：

磨盤洲屯　　管山屯

[25] 萬曆《南昌府志・封爵類・武職傳》16：40a-b記左屯共田32處，前屯共田26處。但由其下所列細目，前屯實則只有16處。詳下。

南昌二衛原額屯田地基山塘堰據乾隆《彭澤縣志》共1722頃61畝餘。[26] 但萬曆《南昌府志》記永樂二年開種左屯田共902頃10畝，開種前屯田共96頃，總計不過998頃10畝。弘治間，左屯田數甚至降到72頃。至萬曆間丈量過左屯田地基塘山堰共885頃0.654畝，實徵子粒正米15024.629石，兼徵餘糧折銀200.815兩，洲地218頃3.211畝，實徵麥豆折銀490.476兩；前屯丈量過田地基塘山堰共588頃73.19畝，實徵子粒正米8602石，兼徵餘糧折銀240.227兩，洲地30頃95畝，實徵麥豆折銀88兩。總計二屯共田地基塘山堰1473頃73.844畝，實徵子粒正米23626.629石，兼徵餘糧折銀441.042兩，洲地248頃98.211畝，實徵麥豆折銀578.476兩。有趣的是，萬曆《南昌府志》中所載子粒正米數、兼徵餘糧折銀數以及實徵麥豆折銀數與附表2是完全相符的；但有關土地的部份，附表2很明顯的略去了洲地畝數，而所謂的「原額幷丈增屯田1504頃68畝」，較萬曆《南昌府志》所載二屯田地基塘山堰的總數略多，但較府志田地基塘山堰與洲地的總和（1722頃72.055畝）則略少，後者的數字約等於乾隆《彭澤縣志》的數字。

袁州衛屯田據嘉靖二十二年刊《袁州府志・武衛志》，應始於永樂二年。[27] 但正德《袁州府志・藝文志・譚九齡・重建衛碑記》記袁州衛於設置左、右、中三所後即「立屯田」，袁州衛三所既設於洪武四年，故其最初開始屯田也應在洪武間。所謂永樂二年云云，應是全面拓展屯田的時間。

袁州衛屯田據嘉靖二十二年刊《袁州府志・武衛志》計有13處，分佈於府下宜春、分宜、萍鄉、萬載四縣。原額田2870頃，歲積子粒原額11850石。嘉靖間現存屯種之戶790，屯田子粒4700石。此數字與附表2所列原額屯田273頃，該子粒正米4740石相較，差異立見。又，乾隆《袁州府志・屯運》謂：「原額屯田坐落宜、分、萍、萬四縣地方，總共田二百三十七頃，內有田九十畝，坐落瀏陽、上高等處」；《江西賦役全書》〈袁州府總〉亦謂袁州衛原額屯田爲237

[26] 乾隆《彭澤縣志・建置志・軍衛》4：22b。

[27] 嘉靖二十二年刊《袁州府志・武衛志》6：21b、正德《袁州府志・藝文志》14：58b-61b。蓋袁州衛至洪武十三年復增置前、後二所，故可判斷譚九齡之記應成於洪武十三年以前，而袁州衛最初開始屯田也應在洪武十三年以前。參見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1004-5。

頃，而237頃之數正合於屯軍790戶每戶30畝之額，推想附表2的原額273頃應爲傳鈔時的筆誤。袁州衛屯田亦分散各縣，在萬載一縣即分爲五處，分別在縣東十里的大樂崗、縣東北五十里的游家嶺、縣北六十里的陪下、高村，及縣西五十里的和尙橋。[28] 另外，瀏陽、上高在隔鄰的湖廣，屯田畝數雖然不多，但在管理上的困擾卻不因之減少。

袁州衛屯田至正德間已「類以老弱孥幼耕，牛具穀種弗備，荒落蕪廢」，因此常以低價出典給富豪家。富豪家喜其價廉，又無徭賦輸納之責，屯軍則樂爲富豪家奴役，如此「佃貨相踵」，久之，竟莫可究詰。[29]《江西賦役全書》〈袁州府總〉謂袁州衛屯田237頃中，由宜春縣民人帶種者1770畝、分宜縣民人帶種者750畝、萍鄉縣民人帶種者5370畝、萬載縣民人帶種者15810畝，是在萬曆間已全數由民人帶種。

袁州衛屯糧催徵情形見康熙《宜春縣志》卷二十，〈兵衛・屯田〉：

> 初制五所爲五十五【伍】，每一伍爲一甲。後以十户編爲一甲，催趱屯糧。舊例每户納米六石，共四千七百四十石。後例每户追折色銀一兩二錢，徵本色米三石，共銀九百四十八兩，米二千三百七十石。尚不敷一年軍餉。

以五所爲五十伍，每一伍爲一甲，是以一百戶所爲一甲。後以十戶編爲一甲，應是配合里甲制所做的改變。上引文謂舊例每戶納米6石，由於明代屯田應納子粒自洪武三十五(1402)年定例爲每軍徵收正糧12石、餘糧12石以來，經過永樂十二(1422)年的詔免餘糧一半，洪熙元(1425)年著爲定例，以及宣德十年的恩詔免正糧盤量，一直要到正統二(1437)年，才改爲率土皆免正糧上倉，止徵餘糧6石，[30] 因此有關的陳述最早不會早於正統二年。屯糧子粒共4740石，是袁州衛屯軍共790戶，應編爲79甲，此一數字約合於嘉靖間的現額，永樂間的原額則絕

---

[28] 嘉靖二十二年刊《袁州府志・武衛志》6：21b-22a。嘉靖四十年刊《袁州府志・兵衛》3：22a-b所載原額相同，但此數字與附表1、2、3中所列原額有極大差距。又參見乾隆《袁州府志・屯運》10：4a、康熙《萬載縣志・武備・附軍屯》5：45b-46a。

[29] 嘉靖二十二年刊《袁州府志・武衛志》6：21a。

[30]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130-32。

不僅限於此。[31] 若以嘉靖府志所記原額田2870頃來計算，每分地30畝，應有9566.66戶，約可分爲956甲。[32] 屯糧的催收以甲爲單位，大抵亦如州縣下的里甲制，每十年一輪。不過在屯地銳減的情況下，如何調整屯甲，以利屯糧催收，應是相當有趣的問題。唯此點也因爲史料缺如，無從探討。

贛州府下有贛州衛及會昌、信豐二所。嘉靖《贛州府志》記府下屯田，計有贛州衛屯田83210畝，歲納籽粒16664石1升；雩都屯田12000畝，歲納籽粒12000石；信豐所屯田27720畝，歲納籽粒4911石73升；興國屯田33000畝，歲納籽粒33000石；會昌所屯田56000畝，歲納籽粒34400石；瑞金屯田6000畝，歲納籽粒6000石。屯軍人數贛州衛2765人、雩都400人、信豐897人、興國1100人、會昌800人、瑞金200人。[33]

嘉靖《贛州府志》的數字與附表2所列出入甚大。表2中贛州衛、信豐所與會昌所的屯田原額各爲815頃55畝餘、203頃40畝、143頃50畝；新增田畝數則各爲181頃21畝餘、64頃20畝與84頃40畝。嘉靖《贛州府志》的數字除贛州衛尚接近附表2之原額外，信豐所的數字約等於表中原額與新增的和，會昌所則遠大於表中原額與新增的和。贛州衛、信豐、會昌之外，又另有雩都、興國、瑞金等處屯田。按：乾隆《贛州府志》卷十八，〈賦役志・軍屯〉謂贛州衛原額幷陞科屯田坐落贛縣、雩都、興國、瑞金、崇義等縣，共田815頃50畝；信豐所原額屯田坐落信豐縣桐木堡，共田204頃91畝；會昌所原額屯田則坐落於會昌縣東北坊等地方，共田228頃30畝。康熙《會昌縣志》卷六，〈賦役志・解款〉更明記會昌所原額屯田761分，其中坐落於會昌縣東北坊者有516分，瑞金縣浮鄉四里有

---

[31] 又據康熙《萬載縣志・武備・附軍屯》5：46a，「永樂二年，奉泰字四十六號勘合，撥袁州衛軍五百員名屯種。」僅萬載一地五處即有屯軍500員名，則全府四地十三處總數必不只790户。

[32] 袁州衛在丙午(1366)年初設衛時原有12所，其後數經變化，至洪武十三年始改爲5所。參見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1004。袁州衛軍原額據嘉靖二十二年刊《袁州府志・武衛志》6：22a爲6156人，此或爲改爲五所後的人數，明初袁州衛軍人數曾一度超過一萬也未可知。但屯田制在當時尚未稱完備，本文的估算僅備參考。

[33] 嘉靖《贛州府志・戎衛》6：21b-26b。天啓《贛州府志・兵防志・軍屯》12：33a所記與此相同。

189分，安遠縣北二圖有56分。每分計田30畝，共田228頃30畝，該子粒米4740石3斗2升。由此推斷，附表2會昌所的原額143頃50畝，可能是漏記該所在瑞金及安遠的屯田所致(30×516＝15480)；而嘉靖《贛州府志》中超額的數字，則有可能是在分別列出各縣屯田數後，又將之重複記入贛州衛的結果。不過，這樣的解釋或能適用於贛州衛、雩都、興國、瑞金等地，對於會昌一地屯田竟高達560頃，較該地屯軍800人所能耕種的240頃超過一倍以上的現象，仍難以說明。究竟這麼龐大的數字是如何產生的呢？

乾隆《贛州府志・賦役志・軍屯》在會昌所及信豐所條下各列有「閩省軍廳寄庄屯田」一項，乃是在雍正十三年題准改歸就近徵解屯糧折銀的。推測應是福建都司所屬衛所在江西地方的屯田，會昌所項下超額的部分，大概都是鄰省福建各衛所的軍屯。[34]

吉安府下有吉安、安福、永新三千戶所及龍泉百戶所，其屯田皆始於永樂間。萬曆《吉安府志・建置志》載吉安所屯田子粒爲2265.774石，新增98.047石。安福所屯田子粒原額3318石，新增98石，計軍屯6所，萬曆九年丈過田地109頃24.9畝，餘田3頃94.08畝。永新所屯田子粒原額3519石，新增63石。龍泉百戶所隸贛州衛左所，屯田有四處，共17頃70畝，歲納子粒354石。各所屯田分佈位置爲吉安所屯田坐落廬陵、龍泉二縣，安福所屯田坐落安福縣，永新所屯田坐落永新縣，龍泉所屯田則位於縣內二十二都大沙、水口等處。萬曆間永新所有屯軍282名，龍泉百戶所有屯軍59名。[35]

萬曆《吉安府志》中三所的數字似乎不屬同一來源，尤其是吉安所的數據像是另有所本。不過由於安福所的數字是唯一明確指出爲萬曆清丈過後數字者，

---

[34] 儘管如此，天啓《贛州府志》的數字仍有難解之處，這就是屯田子粒徵收額度的問題。雩都、興國、瑞金三地均每畝徵子粒一石，若每分地爲30畝，則需納30石；若每分以納6石計，則每分地僅6畝。這樣高的稅額僅見於江南水稻地區，而這樣小畝數的屯田分地卻是不見於明代記載的。參見王毓銓，《明代的軍屯》，72-73，130。下一節在討論興國縣虛糧問題時，引康熙《興國縣志・賦役志・屯糧》謂興國軍屯「初間每分租參十石」，天啓府志或誤租爲糧也未可知，姑存疑。

[35] 萬曆《吉安府志・建置志》14：12b、16a；乾隆《吉安府志・賦役志・屯政考》34：1b、5b-6b。

在與表2比對時就顯得彌足珍貴。與附表2相較，可知表2中安福所的新增餘田數與萬曆九年清丈過的餘田數相同，二者的新增折色米數亦相同，但表2的原額田畝數大於萬曆九年丈過田地數，二者的子粒正米數卻又同爲3318石。永新所的原額、新增子粒數是二者相符的，至於吉安所則府志之屯田子粒額大於表2之原額加新增，府志之新增亦大於表2之新增。上文提到弘治十六年清丈以後定有新增餘田名色，站在這個基礎上考慮安福所、永新所的數字，表2的原額既非萬曆清丈前的現額，就也不無可能是弘治清丈前的現額，新增很可能是弘治清丈後的新增。萬曆《吉安府志》謂安福所萬曆九年丈過田地若干、餘田若干，其中的餘田應解釋爲弘治清丈以來具有「餘田」名色的田，經萬曆九年丈過後現存若干，而非萬曆九年丈後較原額多餘的田。

饒州千戶所屯田在鄱陽、建德（屬南直隸池州府）界，康熙《饒州府志》卷十一，〈賦役志・屯政〉謂其原額屯田共264頃97畝餘，共科子粒米5303石餘。[36]康熙《浮梁縣志》謂饒州所屯田始於洪武間，但據乾隆《建德縣志》，應與南昌前衛、撫州所同始於永樂二年。其初派在建德的屯軍計有467名，屯地有14010畝，該籽粒2802石。[37]

饒州所屯田據附表3約有半數屬建德縣民佃，查乾隆《建德縣志》卷六，〈食貨志・屯稅〉有「饒補」、「撫補」及「南補」，其後附有說明：

> 以上饒、撫、南三所補軍，原係民田，因萬曆九年清丈，軍田缺額，撥民田以補之，故名曰補軍。每年止納軍糧，不當軍差，故不造不運。（中略）前志序所謂民人頂種者，此之謂也。

乾隆縣志所載饒補的數額爲「原撥民田壹萬貳千捌拾玖畝貳分捌厘伍毫」，應徵子粒米爲2417.897石，與附表3「建德縣民佃本所屯田」的子粒數相去不遠。根據乾隆縣志的說法，補軍田的產生乃是在萬曆九年清丈以後，以民田補軍田缺額而成。饒補的數額約與現存軍屯數同，可知萬曆初饒州所屯荒廢的情況嚴重。康熙《浮梁縣志》卷四，〈賦役志・附記〉謂：

---

[36] 正德《饒州府志・公署》2：6a、康熙《饒州府志・賦役志・屯政》11：75a。

[37] 康熙《浮梁縣志・賦役志・附記》4：38b、乾隆《建德縣志・食貨志・屯稅》6：18b。

屯軍之制，洪武間每名給建德縣沒官田若干畝，屯種充餉，守禦郡邑。至成弘中方領漕運，享此屯利，承彼重役，固裕如也。而建德路遙，且隔省屬，日久失業，屯田爲巨族占沒。隆萬以來已有逃亡，明末土兵之亂，軍民十去八九。

其屯田占沒的實際數量大概就是其後撥補軍田的額數，約爲全額的一半。主要原因即在屯田位置隔省，不便管轄。這在同樣具有此一不利因素的南昌衛與撫州所，也都不可避免的發生同樣問題。然而《江西賦役全書》卻僅列出饒州所的部份，「南補」1947.840畝及「撫補」3851.526畝均不載，亦可見晚明《賦役全書》雖具有官方權威性，但仍不免有疏漏之處。

南安千戶所屯田據嘉靖《南安府志・食貨・屯田》計有17所，分在大庾縣嘉善、峰山、雙秀三里之背村、瓦崗、蛇坑、陳塘坑、羊裏坑、助田坑、荊州等地，及上猶縣龍下、振德二里之上稍、中稍、下稍、峰崗、南村、北村、蔡家橋、水陂寨、袁坑、勒江坑等地。凡158頃70畝，該子粒米3174石，歲輸府大備倉。康熙《南安府志・賦役志・屯田》謂南安原額所軍564名，屯田636分，在大庾者450分，在上猶者186分，每分計田30畝，共190頃18畝，子粒糧3269石有奇，共折銀1307兩6錢有奇。後節次荒田118頃42畝，崇禎間題定實在屯田72頃37畝有奇，應徵子粒米1324石9斗3升有奇，折徵銀529兩9錢7分。[38] 嘉靖府志所載158頃70畝與附表2原額同；康熙府志之190頃18畝，以屯田636分每分30畝計，應爲190頃80畝之誤。附表1謂南安所屯田有258頃，較附表2原額屯田158頃70畝與新增田93頃30畝之和仍多，其數據頗爲可疑。

南安所屯額的減少，據康熙《南安府志》卷六，〈賦役志・屯田〉謂：

明洪武初設立南安所，千百户、鎮撫等官統轄旗軍五百六十四名，屯司守禦。於大庾、上猶兩處地方，令各墾荒田自膳。（中略）與他郡職兼運糧者迥別也。厥後時漸昇平，民間業主多持券認回原田者。正德間交趾之

[38] 嘉靖《南安府志・食貨・屯田》20：10a-b、康熙《南安府志・賦役志・屯田》6：11a-b、乾隆《大庾縣志・賦役志・屯田》9：28b-29a、康熙《上猶縣志・食貨志・屯田》4：13b-14a。

> 役，又調所軍三百名隨征，成熟之田聽其轉售民間，補芻茭糗糧之不足。蓋至是而兵與田較原額皆缺過半矣。兩邑田偪處山谷，洪水衝決之不時，節次荒蕪，所在多有。至崇禎間，實在屯田僅存七十二頃三十有餘畝，照數題定完糧。

「正德」應爲「宣德」之誤。[39] 由府志這段文字可知，南安所屯田在承平以後即開屯後不久，已漸爲原業主持券索回。宣德間交阯之役時，調取所軍出征，又因兵糧不足，同時默許所軍售田與民，以充糧餉，致軍額、田額都大幅減損。這個說法如果確實，則南安所的屯田自明初以來即應呈一路下降的趨勢，即使弘治清丈時能丈出若干新增餘田，在原本軍民間的糾葛仍然存在的情況下，絕不可能到萬曆初潘季馴重勘時或《萬曆會計錄》成書時還保持了258頃的高額。事實上，崇禎年間南安所的實存畝數已不及明初的四成，另外六成也不可能是萬曆清丈以後才一起喪失的。《萬曆會計錄》的高數據，就南安所來看是頗有疑問的。

建昌千戶所屯田始於永樂二年，其地皆在建昌府廣昌縣境內。按：洪武末年廣昌縣地「因兵瘼拋荒，官民田地之有額者，租賦無所納」，故於永樂二年差官取勘，將荒田撥軍屯種。原額田地75頃25畝，歲納籽粒米1806石，運送建昌府豐盈倉上納。其後因軍民間多爭訟，弘治十六年，乃差科道部官蔚春等，督同建昌府同知沈景、管屯千戶王整等清丈屯田。[40] 結果清出田地41頃20畝5分，其中13頃75畝應收籽粒米折銀45兩4錢8分5釐，解送建昌府庫收貯，此即附表2所列之「新增餘糧田」。所餘26頃97畝5分，由廣昌縣募得民人吳六等110名自願承種，此即附表2下補註之廣昌縣民種田。這一條史料更進一步的確定了附表2所謂的新增，應指弘治清丈以後的新增。

---

[39] 正德間無交阯之役，宣德間調江西衛所軍征交阯事見《明宣宗實錄》23：10a，宣德元年12月乙酉條：「敕調南北二京諸衛、中都留守司、武昌護衛、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山東・河南・廣東・廣西・貴州都司、福建行都司及南直隸諸衛官軍從安遠侯柳升等統領，（中略）往征交阯。」及《明宣宗實錄》26：2a，宣德2年3月庚寅條。

[40] 以上參見正德《建昌府志・武備》8：25a-26a、乾隆《建昌府志・屯運考》11：1a-b。有關建昌所屯弘治間清丈事，詳見下節的討論。

撫州千戶所屯田在南直隸池州府建德縣，係「永樂初撥所官領軍八百零五名開墾」而成。[41] 弘治《撫州府志・武衛》謂其原額爲241頃50畝，成化中續開98畝5分，通共242頃48畝5分，歲納籽粒米4850石。乾隆《建德縣志・食貨志・屯稅》則謂：「撫州所屯軍陸百零伍名，屯本縣田地壹萬捌千壹百伍拾畝」，與弘治府志頗有出入。[42] 唯二者皆是以每分30畝機械式的乘以屯軍數，乾隆《建德縣志》更明確指出：

> 當日開徵、起解俱屬屯官，在縣止列地土，既無職掌，不煩過問。所以舊志之田地籽粒與現在之田地籽粒迥不相侔。

顯見方志作者對所引用的數字缺乏信心。本文姑採弘治府志之說。附表2撫州所下將原額、新增併做一條，其額數高達390頃有奇，較弘治府志所載高出百餘頃。上文提到撫州所屯田於萬曆九年清丈後有因軍田缺額而以建德縣民田撥補事，又康熙《撫州府志》卷七，〈版籍考・田畝〉云：

> 屯糧在池州府東流、建德二縣。原額幷清出、新增田地通計參百玖拾參頃壹拾柒畝貳分。內先年割除參拾陸頃陸拾陸畝與餘干、安仁民佃種，該子粒米參百伍拾捌石零壹升參合伍勺，係二縣徑自解徵撫州府收納。弘治末年以來，建德縣民徐允清等傳種貳拾伍頃伍拾畝零壹分五厘，見奉勘合，行兩省委官查勘未結停徵外，實在田地參百參拾壹頃零壹畝伍厘，共該納子粒米伍千玖百肆拾石柒斗陸升貳合壹勺，每石折銀肆錢，遞年管屯官解送撫州府交收，俱備助給官軍俸糧。

同書卷十三，〈兵衛考〉亦云：

> 永樂初，撥所官領軍八百零五名開墾江南池州建德，屯田三萬餘畝，歲徵屯糧銀一千九百五十兩三錢五分八厘。又建德、安仁、餘干三縣補軍糧銀

---

[41] 康熙《臨川縣志・武備》11：2a。

[42] 弘治《撫州府志・武衛》16：5b-6a、乾隆《建德縣志・食貨志・屯稅》6：18b。本文暫採弘治府志的說法，乃是因爲這是諸史料中最早出的，可信性應較高。而乾隆《建德縣志》則在列舉南昌前衛、饒州所、撫州所在建德之屯軍額與屯田數後，一方面指出三衛所除屯軍之外，「通共管屯指揮使、千户、百户壹拾柒員」，另一方面又對這些人所領有的屯田略而不計，顯示其疏漏的一面。

共四百零二兩八錢六分六厘，遞解本府，以濟運費。今解司道。

可見建德、安仁、餘干三縣皆有補軍田，[43] 撫州所390餘頃的額數或許即是屯田與補軍田之和。但《建德縣志》所列「撫補」數額僅38頃51畝餘，餘干、安仁的補軍田據康熙《撫州府志》總額亦不過36頃66畝，附表2的數字仍偏高。且《撫州府志》所謂弘治末年以來建德縣民傅種之田僅25頃50畝餘，與《建德縣志》所列「撫補」數額亦不符，或許在萬曆九年清丈後內容有所改變。至於餘干、安仁的補軍田，究竟是萬曆九年清丈後因軍田缺額撥民田所補？抑或爲先年割除與民佃種之田？更是難以查考。或可視爲府縣官因不得參與衛所事而造成的理解上的誤差。這段文字同時指出，「補軍」田的收入是用以濟助運費的，而其他所有軍屯收入則用以「備助給官軍俸糧」。另外，康熙府志提到撫州所屯糧在東流、建德二縣，經查東流縣並無撫州所屯田。[44]

鉛山千戶所屯田據嘉靖《廣信府志・食貨志・屯田》，原額爲229頃，該納籽粒4380石；新陞25頃20畝，該納籽粒504石。同書又云廣信千戶所屯田原額爲207頃50畝，該納籽粒4152石；新陞19頃20畝，該納籽粒252石。此數字與附表2大體相同。嘉靖府志所載自不可能爲萬曆以後的數字，此點亦顯示附表2的新增不可能是指萬曆清丈以後的結果。鉛山所屯田分佈於鉛山、弋陽、貴溪、興安四縣，俱屬廣信府。廣信所屯田分佈於上饒、玉山、永豐、興安四縣，亦俱屬廣信府。[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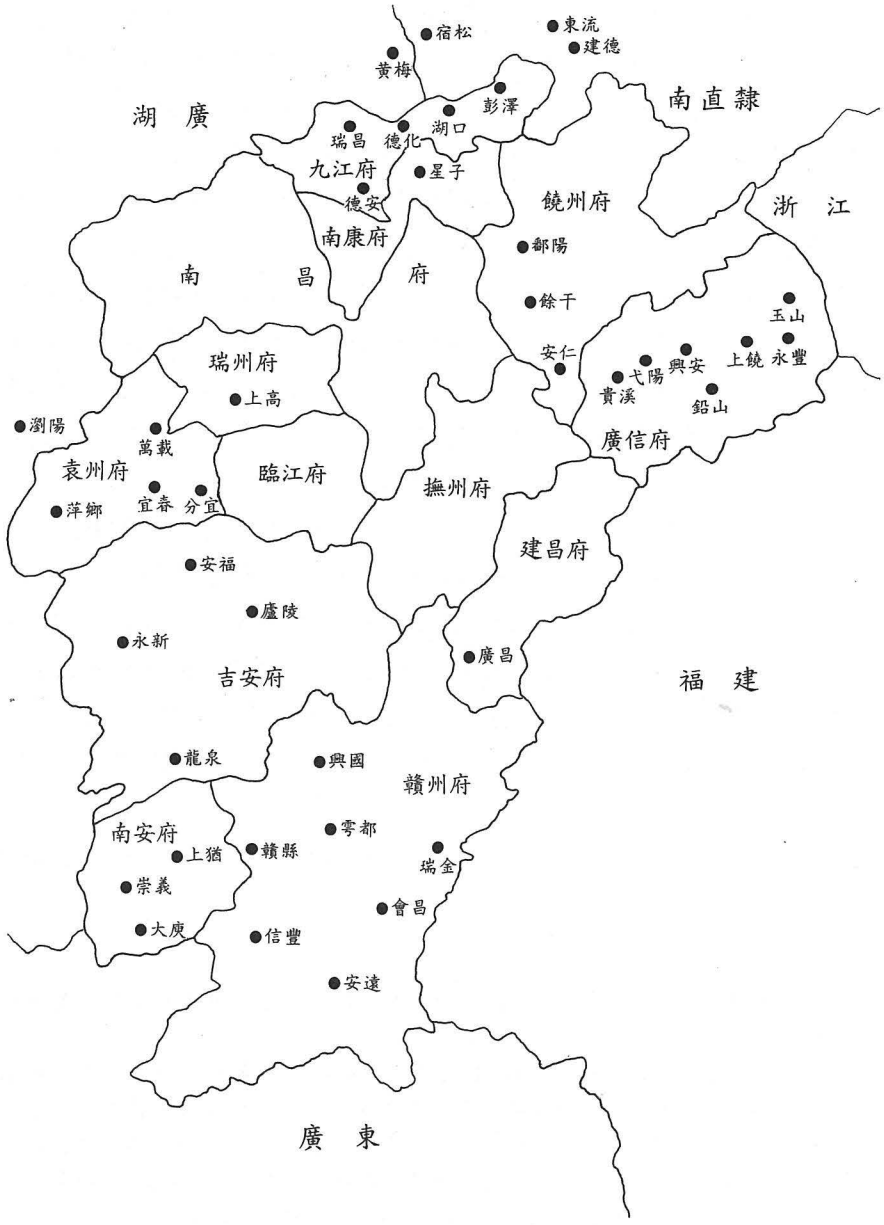
江西衛所屯田分佈情形略見附圖1。經過上述的討論，我們已經相當確定附

---

[43] 又參見康熙《餘干縣志・賦役志・附載》4：47b、同治《安仁縣志・兵制・漕運屯田附》20：4a。

[44] 萬曆《池州府志・食貨・屯田》3：12b載東流屯田僅安慶、南昌二衛，乾隆《東流縣志・民事・田賦》5：35a-b亦僅錄安慶及南昌二衛屯田。但乾隆《東流縣志・地理・疆域・軍屯》2：4b除安慶衛三屯及南昌衛二所外，另列「撫州衛一所」，唯其後的說明爲：「處縣域之東六十里青峰嶺等處，其田開屯于建德，田糧、户口、籍貫俱隸建德縣管轄。」或許東流縣境內有若干撫州所屯，但因全不歸其管轄，故不錄於〈田賦〉之下。

[45] 嘉靖《廣信府志・食貨志・屯田》5：14a、康熙《廣信府志・食貨志・屯田》5：又29b-30b。



附圖一：江西衛所屯田分佈略圖（以縣爲單位）

表2所謂的「新增」，代表了弘治清丈以後的新增；但對表中「原額」一項之所指，仍存在不少疑問。有些衛所可以確定絕對不是明初的原額，但另一些也有可能相當接近明初原額。這個問題最後也許只能歸結到明代有相當長時期地方官因不能干預衛所事務所造成的隔閡，這一點倒是有充分證據可以支持的。上引乾隆《建德縣志》所云：「當日開徵、起解俱屬屯官，在縣止列地土，既無職掌，不煩過問。所以舊志之田地籽粒與現在之田地籽粒迥不相侔。」就是最有力的證據。[46]

另外一點應該指出的是，以原額、新增兩大項來區分屬內屯田的用法或許僅適用於江西，至少不是全國通用的。筆者爲瞭解《萬曆會計錄》的數字是否可信，曾以張海瀛《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一書後所附《山西丈地簡明文冊》中所載山西都司清丈前數字與之比較，發現山西地區有關屯地數額的記錄完全依循了黃冊標準的四柱冊方式，基本上分爲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大項，與江西地區普遍採用的原額、新增方式不同。這點或亦可凸顯出江西地區弘治末年清丈屯田的重要性與特殊性，甚至可用以說明《江西省大志》中所收錄數字所以會產生如是錯亂的情形，部份也是因爲弘治清丈以後「新增」項目的成立導致原本就不熟悉衛所情形的地方官在數字的掌握上更是難上加難。不過，由於筆者對江西以外地區的瞭解有限，只能姑提此說以備後日比較研究之用。

---

[46] 顧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210，有類似的看法。他從「明代較早修纂的方志一般不記載軍事系統的具體狀況」，反過來推論明初軍事系統與行政系統間有相當嚴密的「分權制和對軍務的保密」，可爲參考。不過，由於顧文中舉證有限，其說仍有籠統之嫌。如顧文在頁210前引文後繼續說道：「大約到嘉靖年間由於地方行政官員已凌駕於都司衛所官員之上，一部分方志才載入都司衛所的軍士、屯田數字，但仍有一部分方志拘泥於舊例依然付之闕如。」事實上本節所引弘治《撫州府志・武衛》16：5b-6a就有關於撫州所屯田的詳細數字，原文如下：

> 本所屯田在直隸池州府建德縣，計二百四十一頃五十畝。成化中續開九十八畝五分，通二百四十二頃四十八畝五分，歲納子粒米四千八百五十石。

可見弘治中的方志有些已有關於屯田數字的記載，並不需等到嘉靖以後。由此亦可見分區域爬梳方志的重要性。

綜合上述，不難理解明代史籍中有關江西軍屯原額的記載大多是不可靠的。職是之故，根據這些可疑的數字進行推算，似乎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一定要指出明代江西都司屯地的總數，也只能粗略的說，大抵終明一世約以5700頃左右爲上限，再加上九江衛，明代江西地區軍屯最盛時約達7000頃。[47] 萬曆《大明會典》中江西都司原額雖大於現額，在會典所載全部20個地區中，另外僅在京衛所、四川、貴州有相同的情形，但四川數字之不可信已經過王毓銓氏的考證，[48] 江西地區從弘治清丈之不得不實施，以及下節將介紹的各種問題，推想其屯田數額的增減趨勢應與全國其他地區相類，只是未能正確反映出來罷了。

三、明代江西衛所屯田的弊害與改革

由於資料的殘缺，上一節的討論並未顯示明代江西衛所屯軍所佔的比例。根據王毓銓氏的研究，明初旗軍守屯分數並沒有一定的嚴格準則，一直要到洪武二十一(1388)年五軍都督府更定屯田法，才規定衝要都衛及王府護衛軍士以十之五屯田，其餘衛所以五之四屯田。洪武二十五年，復令天下衛所軍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種，十之三守城，但這個比例似乎僅限於邊地，與腹裡衛所無關。永樂二年，再次更定屯田法，此後屯守軍比例端視「其地之夷險要僻」而定。不過，大體說來，洪、永之間大致是維持了沿邊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腹裡衛所二分守城、八分屯種的局面。[49] 王氏曾收集相關記事作成「明代歷朝軍士守屯比例分數表」，唯其中不見任何有關江西的資料。

---

[47] 前引嘉靖《袁州府志》謂袁州衛原額屯田2870頃，即使曾經存在，也應只是曇花一現，故不計入。又，江西都司雖有部份衛所屯地在鄰近的湖廣、南直隸，但境內也有若干福建都司的屯地，難以精確區分，這部份的出入亦不計入。

[48]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104-7。

[49]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39-51。書中引沉鍾《沉太守集・請軍田仍照例民佃奏》，謂永樂新法爲「沿邊衛所七分守城，三分屯種」；張海瀛，《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310同此說。但王氏在引用沉鍾的說法後，立刻又引楊一清及《明宣宗實錄》所載行在户部言，指洪、永間例爲「邊境衛所什三守城，什七屯種」（頁44-45）。由所附「明代歷朝軍士守屯比例分數表」看來，洪、永間邊衛以守三屯七者居多，本文因採此說。

江西既屬腹裡，屯軍比例原則上可達十分之八。上節附表2中有「屯種軍舍」一項，雖是後出的數字，且屯種者多屬舍餘、佃戶，與明初屯軍墾田自贍的情形大相逕庭；但若從「屯田分數」的觀點來考量，則表2所載「屯種軍舍」數，其意義應等同於明初的屯田分數。如果再考慮到屯地整體說來趨於減少的趨勢，則明初的屯軍人數應等於或大於表2的屯田分數，而明初的屯軍比例就也可以由此推算得出。附表4所錄衛軍原額係根據筆者過去的考證，另外，除表2所載屯種軍舍數外，嘉靖《江西通志》亦載有江西各衛所嘉靖間屯種軍舍數，整理後表列如下。

附表4：江西衛所屯軍人數變動表

衛所名	衛軍原額	附表2所載屯種軍舍數	嘉靖通志所載屯種軍舍數（出處）
九江衛	5700	（5800）	4448（14：21b-22a）
南昌衛	11200	4194	2909（4：22a）
袁州衛	6156	790	790（32：23a-b）
贛州衛	5034	2765	2769（34：25b-26a）
吉安所	?	314	314（24：29a-b）
安福所	?	550	320（24：29a-b）
永新所	?	597	282（24：29a-b）
會昌所	?	761	759（34：25b-26a）
信豐所	?	678	897（34：25b-26a）
南安所	564	553	529（36：22a）
饒州所	?	800	800（8：23b-24a）
撫州所	2284	（805）	805（18：27b-28a）
建昌所	1700	356	256（16：31b）
廣信所	?	756	755（10：19b）
鉛山所	1222	730	274（10：19b）

*資料來源：參見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1020、1030、1032、1034、1037、1040、1044、1048；附表2；嘉靖《江西通志》。附表2所缺據上節考證補。

與附表2相較，嘉靖間除贛州衛小增4人，信豐所有顯著成長外，其餘衛所或維持不動，或呈減少趨勢。上一節曾提到萬曆間永新所有屯軍282名，此一數字與嘉靖間相同，尚不足附表2之半。考慮到弘治以後江西屯田持續荒廢的情形，這個證據也使我們相信附表2的屯種軍舍數很可能是弘治清丈時的現額。若如此，其屯田分數也應更接近洪、永間的原額。比較「衛軍原額」與附表2所載屯田分數，可知明初九江衛與南安所幾乎是全所屯田，其餘則比例各有差。這顯示腹裡衛所雖有較多的人力可以用之於屯田，但受限於各地土地所有的現況，若能夠用於屯田的土地數量實在有限，自然難以達到八分的要求。上一節提到江西衛所屯田有不少位在隔省，多少也反映了這個事實。

屯田位在隔省，在管理上必然帶來很大的困擾。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四收有崇禎七年代其父所撰之〈代司徒公屯田奏議〉，在討論到腹屯之弊時即指出：

> 國初開設屯田，派坐甚遠，幅員甚廣。名隸本衛，地落他處。有相去數百里者，有相去數千里者。軍產民產，相錯其間。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爲豪民所占。蓋地廣而賦輕，故豪民喜得入手，即報新墾於州縣，而屯田自此消滅矣。除同省而越府者清察猶易，如江西之南昌衛、饒州、撫州等所屯田坐落南直地方，河南潁川衛、潁川所亦然。似此類者，恐難勝數。鞭長不及，漁侵莫問。

可知腹裡屯田常因派坐甚遠，又與民產相雜，屯官照管不易，易爲豪民所占。其中「同省而越府者清察猶易」，若江西之屯坐在南直者，則因清察困難，以致「漁侵莫問」。顯然，屯田隔省的問題以江西爲最著，這在方志中自然也有所反映。

例如撫州所，康熙《臨川縣志》卷十一，〈武備〉云：

> 顧今日之爲害有三：屯田寓坐江南建德，半爲豪民侵占，屯軍僅獲虛名。隔省追呼，鞭長莫及。緩則檄同故紙，急則浮江遠遁；按籍則有屯，著役則無軍，其害一也。

屯田爲豪右所佔，衛所徵糧，鞭長莫及。其結果不但無糧可徵，亦無軍可用。饒州所的情形如上節所引康熙《浮梁縣志》卷四，〈賦役志・附記〉云：

而建德路遙，且隔省屬，日久失業，屯田爲巨族占沒。

與撫州所如出一轍。不過，這是站在衛所的立場，如果從州縣的立場來看，問題似乎又不太一樣。道光《建德縣志》卷十九，〈藝文〉，李一元〈答邑尊譚少川論兵書〉云：

我建編民，大約與屯軍相半。夫他邑之屯民皆按堵，而建民獨受其害者，何哉？惟南昌、饒、撫官軍懸寄茲土，勢無所鈐轄則肆，情無所洽比則爭。永樂初，新軍屯集，民已受其積威。及弘治間，因利乘便，而升科、安插、新增之訟，攘攘至今。惟隸於隔省故也。

同卷，李一元〈答朱東原巡撫書〉亦云：

我下邑膏腴之地，在國初先儘屯軍，所遺瘠薄者方付之民。邇來累起重科，縱豐歲不能完稅。加以軍日強梁，併吞得計，訟連隔省，完結尤難。民之積苦於是也非一日矣。

從「民」的角度來看，江西衛軍從初始就佔去了縣內膏腴之地，又因不受縣官管轄，肆無忌憚，併吞了不少民田。弘治清丈以後，所佔民田以「升科、安插、新增」名目納入屯田冊籍，因此而引發的與民戶間的訟案，「攘攘至今」。而又以隔省故，爭訟難結，建民頗受其害。

李一元強調的是軍屯盡佔膏腴，以及軍、民田相混雜所導致軍屯對民田的威脅。事實上，這種威脅普遍見於腹裡各地，即使屯地俱在同省同府者也不能倖免。如乾隆《贛州府志》卷十八，〈賦役志・軍屯〉講到屯政之弊，就將之區分爲二型：

按：明制每正田三十畝爲一分，一丁止許一分，一户止許二分。有占種、典賣至五十五畝以上者，[50] 軍發邊衛，民發口外。此定律也。其後奸軍占田或二三分，或五六分不等。又其甚者，輒指鄰近民田以爲己田。及至按分勘驗，每屯多餘六七十畝，少者亦不下四五十畝。通約餘田，遂至盈萬。於是軍有餘田，民有虛糧，此屯政之壞於奸軍者也。若軍之貧乏者，

[50] 55畝應爲50畝之誤，參見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上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75（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486-91。

> 債主既奪其田，復重其息，糧則令之代納，差則令其白當，追呼逼迫，駕運費勞。於是有逃亡之軍，拋荒之田，此屯政之壞於貧軍者也。

李一元所喟歎的，即是《贛州府志》所謂的「奸軍」。奸軍壞屯，壞在無視於法令之嚴禁，大量占種屯田。甚者妄指鄰近民田爲己田，以致軍有餘田，而民有虛糧。但屯軍不盡爲奸軍，尙有許多「貧軍」。[51] 貧軍力不足以維生，求助於高利貸的結果，最後連田地都爲債主所奪。即使如此，龐大的債務仍然尾隨著他，田雖去仍被迫納糧當差，末了也僅剩逃亡一途，屯地也因之消滅，這才是侯方域所說的豪民占田之弊。而貧軍之所以貧，主要是爲重役所困，在江西，漕運可說是重要關鍵。

乾隆《贛州府志》卷十八，〈賦役志・軍屯〉記漕運與屯田的關係云：

> 至成化間，各省漕糧改民運爲軍運，守禦之丁僉爲造運之丁。其初立法甚嚴，及乎末流，丁多逃亡，田半蕪萊。不得已清丈之，分爲活、絶二種。絶田召民開墾，活田仍屬軍產。然先世受田者習知田之所在，地方無事，租石所入，坐享其成。歷年久遠，子孫生長城市，主佃生疏，以致互相欺詐，百弊叢生，而屯政日淆矣。

即指出以衛軍參與漕運，致軍役負擔沈重，是導致屯丁逃亡，屯地荒蕪的主因。不過，《贛州府志》此言甚簡略，特別是文中所謂以「守禦之丁僉爲造運之丁」，究竟與屯丁逃亡、屯田荒蕪有何直接關連？在理解上有相當的困難。按：康熙《撫州府志》卷十三，〈兵衛考〉有云：

> 撫所軍丁有有屯、無屯之分。其有屯者，原膺造運之責，無屯者只任操守之事。此操軍、運軍之別也。按：自永樂二年調軍八百餘名赴江南建德墾屯三萬餘畝，至末年始派領運，是計田起運，屯軍承造，原自無辭。

文中只有操軍、運軍之別，至於軍屯之有無，則是用以區分運軍、操軍的標準。所謂「計田起運」，《撫州府志》並未做進一步的說明。其意義應指永樂末年派運時，以各衛所現有屯田分數爲準，每十分派領漕船一隻，屯軍因此轉

---

[51] 屯軍分奸軍與貧軍，是當時人的普遍認識。如《天下郡國利病書・江西二・九江府・事宜志》80：15b即謂：「久而衛官幷吞其業，貧軍鬻其業，奸軍展轉其業。」是爲一例。

任漕運，屯田收入則除原有用途外，更需用以承造漕艘，幫貼運糧。[52] 而屯軍在轉任漕運以後，屯田重任也轉由餘丁承擔，至於無餘丁可耕種者，則只有招佃一途。《贛州府志》所謂「先世受田者習知田之所在」、「歷年久遠，子孫生長城市，主佃生疏」的情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無論是屯田爲豪民隱占，或是奸軍併吞軍民田產，乃至於屯丁逃亡，屯地荒蕪，都只有藉助清丈一法代以解決。但前引道光《建德縣志》即指出，弘治清丈帶來的是許許多多紛擾經年無法結案的訴訟。就中牽涉的即是所謂的「升科、安插、新增」田。亦即附表2所列的「新增田」。

關於「新增田」，王毓銓曾有如下的見解：[53]

> 萬曆年間大量屯地中有“新增”一項，凡屬衛所新增屯地都是正軍户下餘丁開墾成業的土地。（中略）餘丁所開種的土地，也是國家聽許他們開墾的荒閑田。不過他們開荒布種的土地和屯軍開荒布種作爲軍屯的土地不同。“軍田五十畝爲一分，一軍承之。餘丁則田無定數，許其過割。”這話所説的雖只是寧夏的辦法，其實也是全國通行的辦法。

王氏把萬曆間的新增視爲餘丁開墾成業的荒閑田，事實上，由上一節的討論及道光《建德縣志》的陳述也可瞭解，至少在江西地區，所謂的新增是特別用來指弘治清丈以後的新增田；而弘治清丈以後的新增，有些是佔據成熟民田的結果。而且江西地區大部份衛所在實施計屯起運之後，耕屯者非餘丁即佃戶，也很難以正軍、餘丁的觀念來區分新墾土地的性質。王氏又謂：

> 我們可以這樣扼要的説，軍餘在營也是耕種土地的。他們所耕種的土地就是明代文獻中常見到的“地畝地”、“起科地”、“科地”或“改科”地。這宗土地雖也受自官府，但餘丁老疾事故可不將土地還官（屯田須還官），可以長期占有管業；因此可以“過割”（賣買），一如農民所占有的土地一樣。餘丁的地畝雖然也和軍屯土地有關，但非嚴格的軍屯土地。雖也交納稅糧，和屯軍的屯田子粒統行交給管屯官，但他們交納的只是稅

[52] 有關「計田起運」的詳細內容，筆者擬另撰專文，與明清兩代江西衛所的漕運一起討論。
[53]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53。

> 糧，不是屯田子粒。如南京各衛軍屯土地每分（五十畝）納子粒六石（正統後租率），畝合一斗二升，而餘丁所種“改科”地則畝納五升三合五勺，是一般“官田”科則（租率），僅僅是屯田子粒的一半。在管理關係上，餘丁地畝屬於衛所，但土地性質則近於有占有權的“民田”。

餘丁耕種的地畝地、起科地或改科地也許並不都算作新增，但因王氏的這段敘述緊跟在前引有關新增田的敘述之後，容易被認作是同一件事，因此有必要加以釐清。以附表2爲例，新增田所應繳納的或稱爲「折色米」或稱爲「子粒正米」；與原額田相較，其科則雖亦有低於原額田者，但如袁州衛則高於原額田，贛州衛、安福所、永新所、鉛山所則大致等於原額田。顯示新增中也有各種不同性質，有些部份與原額田或無差異。由於江西地志中缺乏有關王氏定義下的餘丁起科地之相關資料，本文只能針對史志中所謂的新增、餘田作一討論。

新增若非得自開墾荒田，則必佔自民田。一縣中的土地本有定額，此既增則彼必減。軍屯的新增佔自民田，軍屯的餘田越多，民戶的虛糧也越多。軍與民的糾紛也因之層出不窮。有關餘田的爭議在贛州府興國縣最爲嚴重，以下即以興國爲例，介紹其經緯。

興國縣屯田屬贛州衛。[54]「自永樂二年奉例撥屯田九百九十九分，每分正田三十畝」。[55] 據海瑞〈興國八議〉，[56] 興國縣的屯田自永樂至嘉靖，先後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的變化。其言曰：

> 永樂二年撥軍下屯，大造屯田黃册。軍民各有定分，誠足兵足食良法也。自是而後，軍無耕作之勞，倍收子粒之利，事猶可言。弘治末年，因出清查事例，各軍生奸，指鄰近民田，報作己力開墾，遂增餘田名目。查得屯

[54] 康熙《興國縣志・賦役志・屯糧》3：15b。又，康熙《潋水志林・兵防・宋元明兵制》11：2a亦謂：「興國原設屯田三萬三千畝，屯軍一千一百人，隸贛衛。」

[55] 康熙《潋水志林・志政・明文移・清丈事宜》12：11b。

[56] 《海瑞集》上編，202-3。

> 田原一千分，每分三十畝，[57] 今餘田數約六千餘畝，當正田三分之一。查得隅都虛糧一千八百石，以田多人少，自國初至今，無一畝一坵開墾。民坐都坐里，有虛糧；屯軍原不住屯，佃户何利？何取工食，獨爲之開墾，致有餘田若是耶？軍田大率間雜民田中，四旁非盡山地，何自開墾？軍之餘田，乃民之虛糧。册籍已成，徵收日久，小民賠糧，無能辯訴。猶曰往事可諉也。目今軍人生奸得慣，沿襲而來，凡屯田係是水衝沙漲、水凋拋荒，往往指鄰近田爲己田原有之數。一佃其田，百端生害。無事則子粒倍收，萬一花費拖負，運兑損數，軍糧重事，料上司必爲追理，又捏訟佃户拖欠己糧。一年不完，佃户拖害一年不已。是屯田之爲害於民，自有屯至今，無止日也。

海瑞任興國縣知縣自嘉靖四十一(1562)年十二月始，至四十三年十月止。〈興國八議〉上於嘉靖四十二年，翌年，並清丈田畝，惜尚未舉行即報陞戶部主事。[58] 根據他的觀察，興國縣自永樂二年撥軍下屯以後，起先經歷了一段足食足兵的日子。不久，軍屯俱改由民佃，屯軍不居於屯所。其時屯租雖爲子粒之倍，但所害於民者尚小。弘治末年清丈屯田，因奸軍指稱鄰近民田爲己所開墾之田，遂有所謂之「餘田」。興國縣原額屯田不過三萬畝，丈出餘田竟達六千畝。興國本爲田多人少之縣，國初以來從無民戶開墾荒田之事；而屯軍又非自種其田，佃戶既無工食之給，亦不可能爲之開墾荒田。興國隅都有虛糧1800石，是即軍屯侵佔民田的結果，也就是軍屯餘田之所出。弘治間的清丈，由於作成冊籍，年年按籍徵收，積非成是，小民年年賠糧，有冤無處可伸。而軍戶一旦食髓知味，其後每遇天災事故，田地拋荒，即指鄰近民田爲己田。至於佃種軍屯的百姓，更是飽受屯軍壓榨。平時即需忍受過重的屯租負擔，若有運糧飄失等情，還需代軍墊補。否則被屯軍捏控欠糧，上司礙於軍糧重事，必代爲追索，佃戶將更受拖害。海瑞因此感嘆屯田之危害於民，「自有屯至今，無止日也」。

---

[57] 《海瑞集》原文爲「查得屯田原一千餘分三十畝」，詞義不明，今據乾隆《贛州府志・賦役志・軍屯》18：26b改。《海瑞集》與乾隆《贛州府志》所錄文字略有差異，本文主要依據《海瑞集》。

[58] 《海瑞集・附錄・傳記》586-7。

海瑞以弘治間的清丈作爲屯政敗壞的關鍵，不過，興國縣屯田在弘治間清丈的情形，史志中並未留下任何記錄。只知道在稍早的成化八(1472)年時，興國縣的虛糧已不下七八百石。當時的知府姜璉爲「攢造弔審圖眼」冊，因見興國多虛絕糧戶，「將各圖里銷幷爲五十七里」。[59] 唯此舉或有助於實際戶數的掌握，對虛糧害民的事實卻於事無補。

興國縣虛糧害民的問題既如此嚴重，要求清丈的呼聲便也時有所聞。現存有關興國縣丈量的記事最早見於嘉靖元(1522)年。康熙《瀲水志林》卷十二，〈志政・明文移〉，盧宁〈清丈事宜〉記其事謂：

> 嘉靖元年大造黃册，百姓告請丈量。已蒙撫按各衙門詳允通縣鱗册丈量。知縣黃以册限緊迫，但拘集各排，強使認收。然承認之後，卒又派賠。蓋以處之原非其分故也。

也就是說，嘉靖元年的丈量由於時間緊迫，當其事的知縣又不肯用心，完全沒有落實。只是爲使虛糧有人應承，強拘里排，迫使認頂。這樣的作法自然不能解決問題，因而不久便又賠糧累累，需重新指派里排賠納了。

盧宁在嘉靖丁未(1547)任興國縣知縣時，興國縣的虛糧已經增加到1800石了。他「毅然履畝清丈，正經界而平等則」。[60] 〈清丈事宜〉中詳細記載了丈量方法，並且規定於丈完後立碑造冊。其中有關軍田的部分說到：

> 軍刁民頑，年深業變。四至率皆非舊，遂至互相爭訐。或以界至不明，或以影射侵佔。間有新軍不知田所，聽憑老佃指報。又或新舊管租稍有變故，乘機埋沒，致軍具告。今日將趙甲田認告訐虛，明日又將錢乙田認告□□。甚則均告一錢乙，而東原西壟，前後互異，更迭勘丈，殆無虛日。見奉提督衙門清查軍田，本職吊取衛册，逐一查理。但有影射互異不明之處，即幷丈量。爲之辯正土名坵畝，稽查新舊四至。丈畢之日，即於該里本土名下豎立額碑，上鐫某峒原民田若干，載糧若干，田主某若干，某若

[59] 康熙《瀲水志林・志政・盧宁・清丈事宜》12：8a。姜璉任贛州府知府始於成化七年，參見天啓《贛州府志・職官志》9：16b。

[60] 康熙《瀲水志林・官師》5：11b-12a。但原文謂「縣有虛糧千六百石」，今據同書12：6a改。

> 千；軍田若干，該籽粒若干，屯軍某若干，某若干。就於本里流水歸户册後，造入某字號糧畝四至，一如民田。但要開某軍係某衛所幾缺下，原撥屯租【祖】，[61] 今頂種故軍某名下田。仍另造屯册一本，解衛存縣，庶影佔紛爭或者其稍息也。

盧宁的觀察，與海瑞頗有不同。他認爲屯政之弊，起因於刁軍頑民互相爭訐，倒不能完全諉過於軍。尤其是管租、佃戶欺新軍不知田所，隨意指報，甚或乘機埋沒，紛爭自不可免。因此他在清丈時，對軍田、民田有明確的區分；至於清丈的結果，則不但要立之於碑，還要明諸於册。不過，他的這番努力對於削減興國縣的虛糧顯然沒有任何助益。15年後，海瑞任興國知縣，虛糧之額仍舊，海瑞乃將虛糧之產生完全歸罪於軍屯影佔，並且提出非常強烈的改革手段。〈興國八議〉有云：

> 竊以爲請前日之餘田，補民田之虛賠，此其善之善者也。次之若於事體無妨，革去軍人名目，止此佃田之人輸納子粒。而其輸納也，或併於縣官，或上之衛所，隨宜行之。下之小民無軍人之擾，上之屯糧無虧欠之累，一舉無不利焉。

海瑞想要以軍屯之餘田，補民戶之虛糧；不然，則請革去屯軍之名，直接由佃田之人輸納子粒。更有甚者，他還希望由縣官來督理有關輸納事宜。不過，這些建議都沒有能實現。

興國縣的屯田到了隆慶年間(1567-1572)有了初步的改革，起因是「旗丁抗糧，追比佃戶」。虔院某乃將屯田丈量清查，將縣下所屬贛州衛屯田999分，分作活、絕兩戶，活戶田500分撥給軍丁贍運，絕戶田499分則改由興國縣召民墾

---

[61] 本文所引見該書12：11b-12a，今據同書12：5b改「租」爲「祖」。「屯祖」係指永樂二年最初分軍立屯時撥定屯田的祖軍，其姓名載在册籍，至明末仍爲追徵屯糧時決定屯田誰屬的依據。不過由下文「今頂種故軍某名下田」可知，某屯祖之田經數代之後，雖子孫猶存，頂種者亦有可能易人。其子孫則頂種他人之屯。這種現象的形成，可能是爲收租方便私自更換田所，或因私自典賣所致。

種，給帖爲業，並就近於縣廳完糧，解送贛州府支給衛軍充作月糧。[62]

所謂「絕屯」，據萬曆末兵巡嶺北道梅國樓所稱，[63] 是指「丁倒戶絕，無人耕種荒蕪之田」；「活屯」（或稱「存屯」）則是指「軍丁承頂之田，有人耕種成熟之田」。隆慶間的清查，絕、存兩屯的屯田分數總和並未超過明初原額，且荒廢者幾達總數之半，這種情況與海瑞所稱「軍有餘田，民有虛糧」的景況實在難以聯想。梅國樓與海瑞對軍屯問題認知上的差異在下文還會提及，但若由海瑞在〈興國八議〉中所反映的強硬態度來解讀「絕屯」的意義，田之荒蕪與否恐怕不是問題。所謂「絕屯」，至多代表了原頂種軍戶已丁盡戶絕，其應納子粒無人承納；事實上則很可能爲奸軍隱占，拒納子粒。如果再考慮到海瑞所稱，屯軍遇水凅拋荒輒指鄰近民田爲己田事，則清出的999分絕、活田中，應不乏移坵換段者，其實質內容與明初已大不相同。

以絕屯召佃的方法施行了沒有多久，又引發了不少軍民間的紛爭。原因是衛舍「具告混頂，挾佃收租，意圖拖負子粒」。康熙《興國縣志》卷三，〈賦役志・屯糧〉記隆慶清丈改革後的情形謂：

> 相沿日久，刁軍復生兼併。有臨軍田稍近者，壓佃強收。初間每分租參拾石，今收至伍陸拾石，柒捌拾石不止。所收皆係民田，軍田日增，則民田日減。將原田肆百玖拾玖分，占據過半，人莫敢言。上司以漕務爲重，往往中其狡謀。此興民之大害，牢不可破者也。

---

[62] 乾隆《贛州府志・賦役志・軍屯》18：28a-b、康熙《興國縣志・賦役志・屯糧》3：15b。「歸併贛縣完糧」之田，府志作絕田，縣志作活田。但縣志3：12b-13a記萬曆四十年賦役全書「附載興國實徵絕户屯糧，（中略）俱耕屯佃户辦納」，可見歸併贛縣完糧的應是絕户田。又，負責丈量者《興國縣志・賦役志・屯糧》3：15b謂爲「前虔院潘」，虔院是南贛巡撫的另稱，但查天啓《贛州府志・統轄志・督撫都御史》8：6a-b，隆慶間先後任南贛巡撫分別是吳百朋、張翀、殷從儉、李棠、劉思問等，並無潘姓者。潘姓而爲南贛巡撫者，隆慶以前有潘希曾，係嘉靖四年任(8：2b)。《興國縣志》或誤以之與萬曆初年江西巡撫潘季馴的丈量爲一事。另外，乾隆《信豐縣志・兵防・屯糧》6：17a謂信豐所於隆慶間丈量清查，分活絕兩户。可能在隆慶年間，贛州全府皆有丈清屯田的舉動。

[63] 乾隆《贛州府志・賦役志・軍屯》18：29a在蔡鍾有〈屯田條陳〉後載有「本道梅批」，據天啓《贛州府志・統轄志・兵巡嶺北道》8：18b，應指梅國樓。

這種情況並且一直延續到萬曆二十七(1599)年都沒有任何改善。是年，興國縣丞薛雲綬作〈屯田條陳〉，敘述他經手催徵召佃絕屯屯糧時所遭遇的困境，其言曰：[64]

> 執意催徵之日，徑仍冒佔。有稱爲鄉宦家屬者；有稱爲各衙門書辦者；有明係數百里外異縣異籍，而陡稱爲故軍餘丁者。糧册有成式矣，而彼不恤，必欲更改之；故軍有定名矣，而彼不知，必欲冒頂之。持銖兩之糧，即欲席捲數十畝之熟田；執衛所之票，即欲寢閣諸上司之明文。

薛雲綬的條陳指出，絕屯召佃以後，佃戶姓名雖載在糧冊，不容竄改，但每至催徵之日，仍有許多人藉鄉宦家屬、衙門書辦或故軍餘丁之名，冒頂絕屯。而他們手中做爲證據的，則是衛所發給的票。本來，在州縣文官系統介入屯田管理之前，衛所的票是證明屯地誰屬的主要依憑，有意冒頂者大可經由賄賂衛官一途，取得絕軍屯地。絕屯改爲召佃以後，衛官可掌握的屯田分數大爲減少，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自然很願意爲賄賂者提供衛票以爲僞證。而冒頂者一旦取得衛票，即不顧「糧冊有成式」、「故軍有定名」，爲催徵者帶來極大困擾。

刁軍奪頂召佃絕屯之弊在萬曆二十七年經薛雲綬條陳後，受到知縣何應彪的重視。由於他的大力支持，不久就請得都御史李汝華立石垂禁，「佃戶聊生者二十餘年」。唯日久法弛弊生，及萬曆末年，興國縣絕屯數僅剩約260分，存屯則增爲七百餘分。可知隆慶以來絕屯被屯軍復佔者，已有239分，約爲原絕屯數的一半。於是有知縣蔡鍾有的再度條陳。蔡鍾有〈屯田條議〉謂：

> 卑職蒞任以來，歷見承種屯田佃人紛紛告退，無慮百十家。詢厥所由，一則曰無幸承墾。絕軍荒田竭力墾熟，遂被刁軍垂涎，朋謀迭告，不奪不休。一爲其佃，與馬墳門，大桶加量，科噪百端。既派傳餐，又索下程；既租到舩，又索夫價。一物稍當意，挾以必得，與之則後遂爲例，不與之

[64] 薛雲綬及蔡鍾有的條陳及相關批示參見乾隆《贛州府志・賦役志・軍屯》18：27b-29b、康熙《潋水志林・志政・明文移》12：19b-24b。二者又以後者爲詳。又，薛、蔡二人的傳，可參見康熙《潋水志林・官師》5：17a-b、19a。

則脩郤府告，殆無虛日。民亦何辜，而耕此絕田也。一則曰無辜承耕。攜運軍田之科索，大桶加租，猶其餘者。飲食不當意，碎及器用，辱及妻孥；丟糧不納，帶告上司，勾提到府，先制縛之衛。拷打勒騙之多方，遷延不與審結，雖有得直，而農務廢棄，使費不貲，甚且身家爲是傾隕。民又何辜，而耕此屯田。

蔡鍾有的條陳著重的是承種絕屯以及承耕活屯的佃戶之苦，這一部份是薛雲經未及說明的。絕屯一經墾熟，輒爲刁軍冒奪，承種者淪爲其佃戶，飽受大桶收租，或額外需索下程、夫價之苦。活屯佃戶則在此之外，更要忍受衛軍的百般污辱，有時衛軍於收租後拒不納糧，承佃民戶還要忍受府、衛雙方的拷問；若因之遷延不能結案，更荒廢了農務。這些都促使承佃民人紛紛退佃。蔡鍾有因此要求就刁軍奪頂召佃絕屯之弊再伸嚴禁之令；另外，對於活屯的部分，他也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屯田條議〉曰：

合無請乞遵照前院嚴禁，此後不許軍人奪頂，從前目帖，盡行追奪。萬不能然，寧可租聽軍收，而糧不可不令本軍就縣完納。其於攜運屯田，查陞任楊知府買租贍運之法既已不行，合無請乞照糧折租。如糧該銀一兩，折租該穀六石，其穀存佃，著令就縣完糧，解府聽支。務令先盡糧銀，其餘租穀乃不論多寡，悉聽軍收贍運。倘有頑佃拖租，就縣告理。

所謂「目帖」，與衛票應爲一事。衛票只要存在一天，衛官的介入就一日不可免，而縣官的任何努力也終究沒有落實的一天。蔡鍾有希望廢目帖之制，再不然，也要改令屯軍就縣完糧。至於存屯收入，本擬撥給軍丁贍運，蔡鍾有所謂「陞任楊知府買租贍運之法」，見於條議後所附梅國樓的批文，其法將存屯分爲「上中下三班，上中攜運，最下納徭」。而「攜運則一旗九軍，出餘租爲漕運之費用；納徭則輸貲存庫，爲武弁軍健之工食」。蔡鍾有謂其法已不行，梅國樓則曰「行之既久，法亦良善」。或許又是「有治人，無治法」之一例。而針對此一部份，蔡鍾有亦主張由佃戶直接將屯租全數繳縣，解府貯庫，於扣除應納糧銀之後，所有餘租臨運給軍，用贍運費。也就是將屯田所入全數充作公用，原有之「以屯贍軍」的功能至此被完全否定。

蔡鍾有的態度反映了在現場徵收者因不堪其擾而提出的破釜沈舟之計。但一

如前引康熙《興國縣志》所云，在上者由於同時還得面對漕務的壓力，對問題的考慮就不能如此單純。〈屯田條議〉後附有知府金汝嘉的詳文，其文曰：

> 本府覆詳：該縣於屯田之弊，固洞於觀火，而其爲佃人請命，亦急於救焚矣。衛弁嘖有煩言，固無足異，而揆之亦微有不便者。蓋軍人之奪頂，雖屬承訛，而既已告給，亦屬其贍運之產矣。今欲追奪原帖，盡歸縣官，一不便也。餘租雖曰贍運，不無藉爲生計，今欲其解府貯庫，臨運給軍，將有田者不得需一粟，二不便也。人情叵測，固有以刁軍而魚肉佃人者，亦豈無頑佃而賴其租穀者？今不勝其務，憐佃户之意，而概抑屯軍，左袒佃户，亦似稍偏，何怪其呶呶也。或于今後屯軍往收租者，於府告給一帖，明載姓名、斗擔，詣縣告投。縣給一單，出示諭令，各佃據單交付。其軍人改桶多勒，分外需求，及佃人愆期短少者，並以法治之。即令完納屯糧，方給還原帖，載租出境。庶佃不受害，糧無掛欠矣。

就從三方面來駁斥蔡鍾有的意見。首先，軍人即使是承訛奪頂，一經衛官告給，即屬贍運之產。其時漕運負擔沈重，軍以奪頂之產供贍漕運並不爲過，遽爾奪歸縣官，一不便。屯租雖主要用以贍運，但以造運費用龐大，屯軍生活困苦，若能以屯租補充生計，漕運亦將較易完成。將屯租全數解府，臨運給軍，是有田者不能得一粟，也失去當初計屯起運的本意，二不便。金汝嘉因此批評蔡鍾有一意偏袒佃戶，對於頑佃賴租以致軍受其害的情形卻未能顧及，對屯軍藉屯田以爲生計的現實狀況更是全未考慮。

金汝嘉的建議是維持屯軍自行收租的舊例，但在收租時應受府縣約束。由府發帖，載明姓名、數量，到縣後以帖投縣，另由縣出單告諭佃戶照額繳納。屯軍收得租穀，需先赴縣完納屯糧，始可由縣取回原帖，載餘租出境。期間若有軍人分外需求，或佃人愆期短少，俱治之以法。他並且建議嚴禁屯田私相買賣，認爲屯田私售是造成欺詐朘削之源，這一點則是蔡鍾有未能慮及的。

金汝嘉的建議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屯帖由府而非縣發一事。本來，蔡鍾

有的提案既限於興國，在縣的層次內加以解決似也不失爲方法之一。[65] 但贛州衛衛址在贛州府府治（與贛縣同治）東南，其屯田散在各縣。軍屯改爲民佃以後，屯軍多居於府城，因此對有關軍屯管理事宜，由府出面自無不恰當之處。對於蔡鍾有與金汝嘉不同的意見，兵巡道梅國樓批示：

> 絕屯之議，宜守舊章，蔡知縣之議可行也。（中略）仍令三班存屯各照府議，於府各給一帖，投之該縣，即照帖給單。內開屯田一分，計租若干，更較定火印，畫一官桶，不得多寡升合。軍自召佃，軍自完糧，軍自贍運，各軍屯糧，令於督糧廳照例上納。

分守道王化行批示：[66]

> 軍以奪田增租累耕，民以愆期短少抗刁，軍民兩相呶呶。府議收租告給一帖，明載軍人姓名、斗擔，縣即給單，示各佃如數如期交納，即令完糧。佃無措而糧亦不得以後時，均便之術無踰此者。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張銓則批示：[67]

> 屯田見存，衛軍聽其自收爲便。若凌虐多取，佃户即將原田退還本軍，誰能強之？至絕户屯田，原係招墾，豈容佔奪？即衛官給帖，發給與於何人？若屯田私鬻，尤屬不法。查果有之，如律究治。

有關興國縣絕、活軍屯的爭議，到此算是告一段落。蔡鍾有以地方父母官的身分爲佃戶力爭，可是，存屯田租既是以供贍漕運爲主要目的，站在漕運優先的立場，知府、兵巡道、分守道與巡按御史還是堅持由衛軍自收，只是由贛州府統一發帖給軍，其上註明租額，使屯軍無法超收，佃戶也有所依憑。值得注意的是，爭議中府、縣雙方對問題產生的原因雖有歧見，但包括兵巡道、分守道在內，基本上均承認有衛官發帖、刁軍奪佃的事實，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張銓的批示，卻以幾近霸道的口氣，一筆抹煞。這也顯示明代江西衛所是以漕運爲其最大功能，除屯糧需用以供應衛軍月糧外，連屯租都另外負有爲漕運服務

---

[65] 事實上，明代江西地方的民兵制度就顯現了一府下各縣各行其是的現象，參見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

[66] 王化行之名參見天啓《贛州府志・統轄志・分守嶺北道》8：12b。

[67] 張銓之名參見雍正《江西通志・秩官》47：14a。

的任務。康熙《臨川縣志》卷十一，〈武備〉謂撫州所「其後所職專司漕運，而軍額日蹙，寄操、城守，聊應故事」，亦可爲證。

虛糧的問題尙見於贛州府瑞金縣。瑞金縣屯田屬會昌所，萬曆《瑞金縣志》卷三，〈食貨志・里甲〉載虛糧始末云：

> 洪武年間，本縣膏腴田業被軍占爲七十二屯，而不載糧，以致虛糧重累。浮鄉一里民楊景華因充糧長經解，奮然漆頭奏聞。命未下而歸，卒於采石。其子仕隆、仕忠復題結正，欽差官臨縣踏勘，遂將虛糧派入軍屯，以納子粒。因併圖分作五鄉八里，民始得甦。

楊景華詣闕奏聞的時間不詳，康熙《瑞金縣志》卷八，〈鄉賢志・義行〉有「楊景華傳」，但亦不記其時，只提到所派欽差官爲「將軍張可大」，而楊景華以糧長經解赴京上奏，其後又卒於采石，可能是國都尙在南京的時候。若如此，則瑞金縣虛糧的問題並沒有困擾縣民太久，即因楊氏父子的努力獲得解決。當然，瑞金的虛糧問題與興國的情形並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在立屯之初佔田而不載糧致民戶代賠，後者則是在興屯之後屯軍侵佔民田以致民納虛糧。瑞金縣據縣志「楊景華傳」原有四鄉十七里，併圖後分作五鄉八里。因將虛糧改派子粒，民始得甦。萬曆三年奉道府詳明，將絕戶阮祥等屯田24分發縣召佃耕種，遞年屯糧折銀上納。18年，奉府命吊回3分，其後又陸續發下趙貴等絕屯6分，共27分，「俱赴縣折銀完糧，本縣轉行典史追徵，呈縣解府」。[68] 這一部份的發展與隆慶以來興國縣以絕屯召佃的情況相似。

佔田而不載糧致民戶代賠的問題亦見於建昌府。康熙《廣昌縣志》卷二，〈籽粒〉謂建昌所之屯曰：

> 廣昌籽粒一款，無田認畝，始於明永樂二年。以荒田磽地，勒民虛賠之錢糧也。因建昌所軍每每占民田之成熟者爲屯田，民心不甘。至明宏治七年，始編爲一百一十篷，每篷虛認租四石一斗二升，共折銀八錢二分七釐。逮後兵荒，洊至逃亡死絕者多，止得八十三篷，復收入册，相沿迄今，每篷民屯子粒銀八錢二分七釐，照舊徵收。

---

[68] 萬曆《瑞金縣志・食貨志》3：14b-15a。

同卷，〈屯田〉又謂：

> 觀今之屯者，籍非邑編，悉住府城，田尚召人爲承佃。（中略）其恣擾侵疆，挾爭搆訟屢。幸上人明直之，稍就寧止。而流毒終未之塞。嗟嗟窮氓，不惟兩賦之輸艱，抑且數端之罹害也。（中略）考明洪武間，止有官民田，無屯田。永樂間，以官民田之荒者撥軍屯種，遂有屯田。而此田竟爲軍有。爲軍有尚可言也，久之苦民佃矣，軍影占矣，所弁科派矣。而今且當事者又疏請照浙省例加徵折色矣。況今年改見運，明年改缺船，納户無所適從，所軍惟知網利。後來之憂，又寧有底哉？

上節曾提及洪武末年廣昌縣地「因兵瘼拋荒，官民田地之有額者，租賦無所納」，故於永樂二年差官取勘，將荒田撥軍屯種。但由上引文可知，建昌所軍於永樂二年撥屯時原應以官民田之荒者爲屯田，但卻多占民田之成熟者，而原撥荒田亦本屬民戶耕種之田，改爲軍屯以後，與民戶間的糾紛也特別多。正統、天順、成化年間節次清查，「致軍民訐訟，官司會踏」，不勝其擾。弘治十六年，乃差科道部官蔚春等，督同建昌府同知沈景、管屯千戶王整等清丈屯田。同年，又有廣昌縣主簿陳天敘刊籍定冊。[69] 不過，對於這次清丈的結果，方志中的記載卻多彼此不符之處，其間的矛盾似頗堪玩味。

據正德《建昌府志・武備》，蔚春等履畝清丈的結果，計清出田地41頃20畝5分。其中13頃75畝應收籽粒米折銀45兩4錢8分5釐，解送建昌府庫收貯。所餘26頃97畝5分，由廣昌縣募得民人吳六等110名自願承種。民種田應納籽粒米計429石餘，因陳天敘的建議，將其折銀85兩8錢餘送納廣昌縣收貯，以備建昌所隄備官軍口糧支用。乾隆府志〈名宦傳〉並指出陳天敘與此同時，還針對屯政

---

[69] 以上參見正德《建昌府志・武備》8：25a-26a。其中記載蔚春與陳天敘的清丈定制，文字敘述並不清楚。徵引如下：

> 弘治間，欽差科道部官蔚春等，督同建昌府同知沈景、管屯千户王整等履畝。（中略）弘治間，本縣主簿陳天敘建議刊籍定制。

據乾隆《建昌府志・名宦傳》35：31b-32a，陳天敘任廣昌主簿始於弘治十四年，同書35：32a則謂沈景同知建昌亦始於弘治十四年。上節提到弘治十六年江西地區曾奉欽差科道大規模清丈屯田，因此定沈之清丈屯田與陳之刊籍定冊爲此年。

缺失，定例11條。是爲1、清屯事例，2、管屯事例，3、折銀事例，4、屯田定制，5、屯田始末，6、發民佃種，7、定派新糧，8、屯田奸弊，9、查勘餘田，10、造冊始末，11、冊籍數目等。可見在清丈之餘，還設計有一整套管理的制度。而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冊籍的制訂。〈名宦傳〉謂「由是宿弊悉剖，人爭繕而藏之，至今受其賜」，可說是陳天敘的最大貢獻。

康熙《廣昌縣志》的記載則頗有不同。卷二，〈籽粒附〉引舊志，謂弘治間因賦額不足，軍民告訐，差科道清查。遂以實在成熟田地116頃歸所，稱做「有耑田」，收其租贍運。其餘荒山河地，磽确不堪耕種者27頃47畝，則委由官民田地之相近者代賠錢糧，「歲供贍丁」，裨免爲軍舍影占。其田稱作民屯，其糧稱爲籽粒；但只有畝之名，而無畝之實。至弘治七年，因其糧徵收不繼，知縣勸諭十排糧長，以五六家爲一篷，將前項荒山地畝分爲110篷，每篷應科籽粒改納折色銀8錢2分7釐，共該歲納銀90兩9錢7分。因屬虛納籽粒，稱爲「無耑戶」。[70]

康熙《廣昌縣志》中的「無耑戶」110篷，與正德《建昌府志》中所謂的民人吳六等110戶應爲一事。二志所記之田畝數字雖略有差異，但大致仍相符。「無耑戶」代賠之錢糧縣志稱其用途爲「歲供贍丁」，與府志之充作隄備軍口糧不同；但縣志所載爲弘治七年前後的情形，弘治十六年以後自有可能改作他用，因此這些都不成問題。問題是這110戶的性質應該如何去認定？「無耑戶」所認之田稱作民屯，其田俱屬磽确不堪耕種之類，只因地在軍屯與己田之界，而被迫認納其糧。對民戶來說，自是額外的負擔。因此於清出後不久，即因徵收不繼改由各戶朋充。然則，府志中的民人110戶又如何呢？

正德《建昌府志》卷八，〈武備〉載有正德十(1515)年兵備副使胡世寧之言，乃是針對陳天敘以民戶承種屯地糧充作隄備官軍口糧一事所做的討論。（按：廣昌縣設「隄備官軍」，始於成化二十三年，有官2人，領兵120名，分二

[70] 康熙《廣昌縣志・籽粒附》2：46a-b。47a以下缺頁，參照同治《廣昌縣志・賦役志・籽粒》2：62b-63b。

班更戍。）[71] 其言如下：

> 查得本所原有屯地三百零一分，以後清出軍民侵占迷失屯田一百六十五分，每分皆二十五畝，俱坐落廣昌縣地方。其田鄉里每分上者每年收租谷七十餘石，次者收五十餘石，下者收二十五石。其田多係原籍在彼住坐富軍，幷府城有力舍餘共三百五十六名，及原占豪民一百一十户承種。每年坐收租利，出半其息，或分之一，以納子粒六石。其清出新田，又止折徵價銀一兩二錢。彼既坐享田利，影射正差，卻又令撥在城旗軍在彼隄備，重支口糧、月糧。因無家小在彼係累，聞賊即逃，累國誤民，莫此爲甚。

在胡世寧眼中，這110戶承種軍屯的民戶乃是豪民，承種的110分軍屯乃是租利甚豐的膏腴之地，或至少與其他356分軍地地利不相上下。[72] 從弘治七年到正德十年，期間不過21年，磽确之地似不易立即轉成膏腴，這種認知上的差距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

康熙《廣昌縣志》卷二，〈屯田附〉記弘治間蔚春等清丈事，其後謂：

> 已上屯田頃畝數目，具載郡志。東州夏先生必據千户所册查書，今俱因之，但與縣簿陳天敘刊定告示小册差有不同。

由此可知，廣昌清屯之後，建昌千戶所及廣昌縣各有冊籍記錄，且二者所記內容是「差有不同」的。方志作者因所依循的史料不同，而有若是差異的記載。上述對「無耑戶」的兩種極端看法，或許即分別存在於千戶冊與縣冊之中，代表了軍政系統與民政系統的不同認知。

現在再回頭來看胡世寧的意見。他反對陳天敘以民戶承種屯地糧充作隄備官

---

[71] 正德《建昌府志・武備》8：26a-b。

[72] 同治《廣昌縣志・賦役志・漕運附》2：65b謂：「明正德間清查建郡屬屯地實有三百零一分，以後清出軍民侵占迷失屯田一百六十五分，每分各二十五畝，俱坐落廣邑揭坊等鄉里，皆膏腴之區。係豪民吳六等一百一十户原佔耕種，情願納租科籽粒以供貧丁出運之用。」很明顯的是引用了胡世寧的說法，但誤以胡世寧所在之正德年間爲清丈之年。不過，除了時間上的訛誤以外，卻也相當正確的反映出胡世寧對這些豪民所佔之地作何理解。又陸鍵〈屯田説〉謂：「建所之有屯田也，皆境内膏腴之區，爲有力者所必爭。而近屯民田被其侵闢，又地名雷同，影射妄認，民莫敢誰何。故屯比民田獨寬數倍。」代表的是同一看法。參見萬曆《建昌府誌・附乘八説》2：48b。

軍口糧，乃是因爲廣昌地方屯租之利甚厚，屯糧負擔卻極有限。屯軍舍餘乃至佔田豪民坐享其利，卻要另撥旗軍代爲隄備。以致隄備旗軍因外調而重覆支糧，又因無家小在彼而無固志，遇賊即逃，全無實效。因此他主張由「本處委官一員，將廣昌縣新舊屯田四百六十六分再行踏看高低，品搭美惡，均平所有」，使建昌所正軍除上運者外，其餘盡數撥予廣昌屯田。若正軍不足數，再以舍人餘丁補數。分得屯田者不論是招佃收租或自己耕種，「各隨所便」。而屯田所「該納籽粒及收徵價銀，就與准作該關月糧，免其納官」。原隄備官軍全數裁撤，僅需由建昌所委官一員，統領屯田軍舍，「令其常川在彼操守」。至於以百姓佃種者，亦不需繳納折徵銀兩，但須由承佃百姓「認當民社一名」，與屯軍一同操練。如此每年不過減徵籽粒米1806石、折徵銀198兩，卻可得常操軍士466名。又因裁撤隄備官軍120名，節省官糧6990石，所省遠超過所虧。而屯軍愛其土地，有事時必全力以赴，則所獲更有大於前者。胡世寧同時建議將建昌在城舍人餘丁盡數查出，令每二丁或三丁朋充一軍，與南城縣機兵一同常川操守建昌府城池。對於各項無用差使，則令盡行革去，不許多占食糧正軍。可以說他所有的主張都是以節餉增兵爲主要目的的。

胡世寧的建議完全以軍事目的來考量，然而站在民政的立場，卻有其窒礙難行之處。由廣昌縣知縣張璨的覆議申狀可知，當時屯軍由於「久處府城，固不願遷來耕種」；而承種百姓也因「瘡痍甫定，情願照舊辦納籽粒，亦不肯充當民兵，比軍常操」。此外，胡世寧的主張需以重新清丈爲基礎，張璨也以過去曾兩次委官丈量，[73] 不宜再行踏看爲由，婉轉拒絕。最後決議令原種屯田民人吳六等110戶每年該納籽粒米429石餘仍照例每石折銀貳錢，將全部折銀85兩餘「准作前該輪班官軍每班六十一員名月糧」，不必另行繳官。另外再以廣昌縣遇例放回屯軍29名留縣隄備，不必赴所操練。其月糧由屯糧中直接支給，免其赴所交納。同時又由屯軍356名中「每歲添撥五十名來縣」，減免屯田每分所納籽粒歲六石爲四石，所減部分「准作新添在縣防守屯軍五十名內月糧支用」。加

[73] 所謂「兩次」，或指康熙《廣昌縣志・籽粒附》2：46b中的弘治初爲一次，乾隆《建昌府志・屯運考》11：1a-b中的弘治十六年爲一次。

上輪撥正軍、廣昌縣遇例放回屯軍、白水鎮弓兵及原編機兵，總計廣昌縣兵力可達602名。[74]

建昌所的屯田到了嘉靖以後，又逐漸爲勢豪所影佔。由上引胡世寧之言可知，建昌所屯地合「原有」及「以後清出軍民侵占迷失屯田」共計466分。其中有110分係由豪民承種，所餘356分則多爲原籍建昌的富軍，[75] 或居於府城的有力舍餘所占。及萬曆中期，356戶的屯田中僅289戶爲「成熟大糧」戶，每戶額田25畝，應納正耗米6石4斗，折銀2兩5錢6分；53戶爲「折徵屯田」戶，應納正耗米3石2斗，折銀1兩2錢8分。另有14戶因水打沙堆，無人承種，稱作「事故屯田」戶，其應納正耗米折銀由成熟大糧戶及折徵屯田戶內派納。總計歲收屯田籽粒共正米1806石，耗米99石3斗3升，奉例改折徵銀每米一石折銀四錢，共銀762兩餘，另新增餘糧折徵銀45兩餘，共銀807兩餘。[76] 萬曆三十七年，乃有署府事推官陸鍵又一次清理屯田，翌年，經知府鄔鳴雷覆覈詳允，軍政爲之一清。

萬曆三十七年的清理屯糧，起因於屯田負擔不均及豪強侵佔屯田。萬曆《建昌府誌》卷七，〈武備・附知府鄔鳴雷均糧節略〉云：

> 看得該所屯田，大糧一分，納銀二兩八錢〔按：應爲五錢之誤〕有奇；折徵一分，納銀一兩二錢有奇；而事故屯銀併於大糧、折徵內派納。第查大糧、折徵，俱有上、中、下田，有大糧而租反少，折徵而租反多，乃其納

---

[74] 正德《建昌府志・武備》8：26b-29b。所謂減免屯田籽粒，似指減免其上納建昌所的數額，由於所減部份仍須供作防守屯軍月糧，每分屯田的實際負擔應是不變的。

[75] 按：原文爲「原籍在彼住坐富軍」，究指原籍建昌，分派外衛之軍戶戶丁？抑或原籍、衛所俱在建昌之軍丁？不詳。

[76] 萬曆《建昌府誌・武備》7：5a-b。按：府誌所載數字一如上述，但仔細計算後可知問題並不如此單純。據府誌，成熟大糧戶與折徵屯田戶應納正耗米總和爲6.4石×289＋3.2石×53＝2019.2石，應納折徵銀應爲2.56兩×289＋1.28兩×53＝807.68兩。但府誌又載歲收正耗米總計1806石＋99.33石＝1905.33石，較上舉2019.2石略少。1905.33石折徵銀共762.132兩，加上新增餘糧折徵銀45.485兩，總數爲807.617兩，此數方合於上列成熟大糧戶與折徵屯田戶應納折徵銀總和。可見萬曆年間屯田子粒總額是由「成熟大糧戶」與「折徵屯田戶」定額分擔，但所謂「折徵屯田戶」是否即弘治中的「新增」則不詳。

> 糧不啻懸隔。今查該所所定兑價，每租一石，議銀五錢，既可據租以定價，獨不可據租以定糧乎？緣是本府通查屯租之數，不論大糧、折徵，每屯田若干畆，收租若干石，每石輸糧若干，兑價若干，印給小票，粘于屯帖之上。仍用印鈐蓋，發軍舍收執。復行文廣昌屯户知悉，照票交租，不許軍舍分外勒索。又況事故屯田亦經本府查出，俱係所官影占，藉口事故。内有田極膏腴，而收租之多，反在大糧、折徵之上者，業已將一十四屯盡數查明，給與無田軍舍佃種，則該所三百五十六分之屯，頃且盡還故物矣。

改革的要點第一是「據租以定糧」。當時建昌所的軍屯絕大多數是由佃戶承種；軍舍收租，其田租由所方統一兌價爲每租一石折銀五錢。大糧成熟戶每分屯田應納正耗米較多，但實際上因田分等則，其應付租銀有少於折徵戶的情形。租銀最能反應屯田的實際狀況，爲免負擔不均，首先改以租額定糧額。萬曆三十七年清查各屯租谷共計11756.72石，以每屯租一石納銀6分8厘6毫餘，將可合糧額807.617兩之數。於是廢大糧、折徵之分，每分屯田應納屯租及應兑折糧銀之數均印於小票之上，再黏於屯帖，交軍舍收執。佃戶照票交租，亦可免除受軍舍額外勒索之苦。此外，原列爲事故屯田的14戶也全數清查而出。其中有十屯是爲所官影占的膏腴田地，由官府另招佃戶承佃完糧；另四分則於清出後給軍舍開墾，於三年後照例起科。經此一清，建昌所所有356分由軍舍屯種之屯乃盡復舊觀。而過去屯糧子粒以每分田爲單位不論肥瘠均收6石的徵收方式，也有了革命性的改變。糧額依租額而定，如果租額定的合理，則糧額亦能充分反映田地的狀況；否則即使有刁軍多取屯租的情形，因所納糧額亦相對提高，站在政府的立場，便也無意多加干涉。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鄔鳴雷清屯的對象僅是356分軍屯地，前述110分爲「豪民佔種」的土地，是不在此次清丈之列的。

鄔鳴雷〈均糧節略〉後附有「清屯凡九款」。[77] 其內容如下：

1、清出爲勢豪影占屯田99分，給予無田軍舍佃種。

---

[77] 萬曆《建昌府誌・武備》7：8a-b。

2、清出事故屯田戶14分，其處置方法已如上述。

3、屯帖過去向由管屯官發給，內容朝更夕改，常被引爲需索之資。今則改由建昌府頒定格式，重新刊印。軍舍有欲退佃或頂種者，赴府呈名，由府發給屯帖。盡革所官換帖常例。

4、由建昌府較定收屯租桶大小，親筆花押，不許參差。另給小票爲驗。如有以舊桶收租，或無小票爲據者，即係軍舍詐僞勒索，許各佃稟究。

5、屯糧過去向由所官徵收，常因奸舍影占，至多逋賦。今後改行自封投櫃，設櫃於儀門右側耳戶，聽軍舍自行封號投櫃。[78] 管屯官止許監收籍記，夜間連櫃封貯府庫。完納之日當堂拆封，如有短少，照名提究。

6、徵糧仍分三櫃徵收，八月徵頭櫃，九月徵二櫃，十月徵三櫃。每櫃又分三限，逢月初五完頭限，十五完二限，二十五完三限。一櫃徵完，即於月盡日當堂拆封，發做操軍月糧。盡革所官勒取火耗及對支之弊。

7、三櫃已完，即於十一月初旬例報屯道。如有奸刁軍舍過期拖欠，不能完納者，除重究經催人員及本犯外，並奪其屯，招人另佃；沒其糞土銀兩以抵欠糧。

8、除糧額照租額訂定外，每屯租一石，另定「糞土銀」五錢。與屯租、糧銀數俱刊於浮票，明貼於屯帖之上，用印鈐蓋。照數輸糧，亦照價頂兌，永除不均及紛爭之弊。

9、過去建昌所的公費（18兩），及都司徭銀（12兩）、吏目柴薪（12兩）等項費用，俱係由大糧內幫貼。此次均糧之後，不得獨累大糧，聽所官照例通融均派取用。

九款中，除少數項目外，均可明顯看出地方政府勢力的介入。如第一、二款，所官、勢豪影占之屯，由官府另行召佃；第三、八款，過去由管屯官發給的屯帖，改由建昌府定式刊印發給，有關軍舍退佃或頂種事宜，改由建昌府管

[78] 按：萬曆《建昌府誌・武備》7：5b謂：「萬曆三十六年，郡守鄔公置櫃于儀門之右側，收貯府庫。」但據乾隆《建昌府志・名宦傳》36：18a-b，鄔鳴雷由刑部員外郎出守建昌在萬曆三十七年，因此不可能早於萬曆三十七年。

理；第四款，收屯租桶大小由建昌府較定、檢驗；第五、六、七款，過去由所官徵收的屯糧，改以自封投櫃的方式由建昌府監管、發放，管屯官僅有監收記錄之責等都是。另外，鄔鳴雷清屯九款中第六款有所謂「對支之弊」，這一點留待第四節再討論。

江西尚有若干衛所無漕運之責，即南安所、會昌所與信豐所。南安所屯田大幅減少的原因有二。其一爲人爲因素，另一則爲自然因素。實際情況已見上節的討論。簡而言之，明初南安所開屯的情況與建昌所相近，有不少原是有主之田。承平以後，漸爲原業主持券索回。交阯之役時又因兵糧不足，調取所軍出征，同時默許所軍售田與民，以充糧餉，軍額、田額遂俱大損。而屯地逼近山谷，洪水爲患，亦使屯多荒蕪。崇禎時，實存畝數已不及明初的四成。南安所軍以守禦爲專職，不事漕運，因此屯田收入以「贍軍」爲要，而竟減損至此，明末屯田功效之低，亦由此可見一斑。

本節最後想要討論的，是有關屯田賦重或輕的問題。前引侯方域〈代司徒公屯田奏議〉謂腹屯「地廣而賦輕」，王毓銓則謂南京各衛餘丁改科地之科則與官田同，僅是屯田子粒的一半。道光《建德縣志》卷五，〈食貨志・屯稅〉載有孔貞運〈屯田條議〉謂：

> 建德屯田之苦，有不堪縷述者。每額田一畝，實算一畝，非若民田折册起科也。所弁按册徵收，不論水推砂積，下則概輸上則之糧；不論軍逃田蕪，虛田亦納實田之賦。計弓一畝，正餘籽粒納銀七分二厘，加之都司柴薪、夫馬、管屯供應、編扛新例、濟漕雜項，每年四五分不等，較民間田賦，已重十之二矣。比安慶衛田之隸東流，每户三十畝，納籽粒一兩者，又不啻歲倍取其三。然一經領運，世代相承。十年大造，費近千金。每歲襯運，需亦百兩。比之民差十年一役，較之他衛輪流更運，苦又十倍矣。至追漕欠，則開報全憑運弁，而實數不可稽征；雜項則名色只憑撫府，而額數無定據。倘奸猾朋比，以少作多，以完作欠，西省固隔越難控，南都又痛養不親，無怪十軍九困也。

建德屯地分屬江西南昌衛、饒州所與撫州所。據縣志，建德屯田應納子粒科則較隔鄰東流縣所屬安慶衛屯田子粒科則已爲一倍以上，如果加上「都司柴薪、

夫馬、管屯供應、編扛新例、濟漕雜項」，則所出更爲安慶衛的三倍，較建德民間田賦也高出十分之二。顯然各衛的情況並不一致，絕對不可一概而論。這一部份因資料有限，不擬深論。

綜合上述，明代江西地區因地處腹裡，雖有較多軍力可投入屯田，但受限於土地開發的現況，明初除九江衛、南安所爲全衛所屯田外，其餘衛所屯田的比例多寡不一，並無法達到一律八分的標準。又因爲這些地區本多有主之田，即使在明初因戰亂呈一時荒廢之勢，承平後原主復業，與屯軍間的紛爭勢所不免。而若干地區因可領種荒田數量不足，甚至佔用到隔省土地，也是江西屯田的一大特色。先天不足導致江西軍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永樂末年實施計屯起運以後，屯軍投入漕運，軍屯耕種仰賴餘丁、佃戶，更加速了軍屯的敗壞。貧軍不堪重役之苦，典賣屯地；部份奸軍則大量兼併屯地，隱匿屯糧。軍屯民佃使屯軍不知田所，造成佃戶隱佔軍屯的絕好條件；而與軍屯鄰近的民田，也時有被奸軍侵佔之虞。於是一方面有豪民侵佔屯田，另一方面則是軍有餘田，民有虛糧。要求軍屯清丈的呼聲便也時有所聞。

弘治十六年的大規模清丈，以欽差科道爲首，由府州縣官與衛所管屯官一體施行。清丈的結果雖載在冊籍，卻是州縣與衛所各有一冊，其內容亦不盡相同。這使得弘治清丈反而成爲江西屯政敗壞的關鍵，尤其是清丈後另立的「新增」一項名目，更是紛亂之源。軍民爭議的擴大，促使地方官開始嘗試採取更積極的手段來解決稅糧徵收的問題。萬曆中期以後，至少在贛州衛及建昌所，有關屯地管理與屯糧徵收事宜，已由衛所官之手移至府州縣官的掌控中。移轉的過程不一定很順利，衛所官濫發衛票是使問題複雜化的一大因素，但是透過兼管民事與軍務的巡撫、巡按監察御史的同意，府州縣官在軍屯的監管上逐漸取得合法的地位。入清以後非漕運衛所的裁撤，屯糧徵收完全納入府州縣系統，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79]

---

[79] 檜木野宣，〈衛所の行方〉，《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論集》3（1954），收入《清代重要職官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5），369-77，本文所引頁碼爲《清代重要職官の研究》之頁碼；郭松義，〈清朝政府對明軍屯田的處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會科學輯刊》4（1986）：46；顧誠，〈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1988）：116-21。

四、明代江西衛所屯田籽粒供軍的比例

明代推行屯田，其目的本是爲了贍軍自給，但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的盛況，僅見於永樂間極短的時間。[80] 關於明初江西衛所屯田的功效，由於屯田原額及祖軍人數已不能完全掌握，無法討論。本節擬利用《江西賦役全書》中的相關資料，探討萬曆末年江西衛所屯糧供軍的實際狀況。

現存《江西賦役全書》缺南安、建昌、撫州三府資料。另外，除九江府部份似有缺漏致內容不完整外，其他各府縣記錄的方式亦有詳略互見的情形。儘管如此，除南安、建昌、撫州三所情況不明外，其他各衛所官軍俸糧支給的情形已大略可見，由之亦可知其間之歧異甚大。以下即按第二節排列的順序，介紹江西地區各衛所官軍俸月糧額及其來源，藉以明瞭屯糧供軍的比例。

1. 九江衛：

九江衛資料不全。僅知該衛運官、經歷俸銀，令典吏糧銀，上江幫、下江幫官軍行糧銀共歲支銀2887.312兩，合經歷・令典吏三年攤閏銀每年該銀1兩（運官俸銀、運軍行糧遇閏不派），共歲支銀2888.312兩。由府倉米銀1333.589兩儘支外，尙少銀若干，於夏稅存留府倉麥米銀內支湊。衛官鈔銀另額支給，不在府倉米之內（〈九江府總〉6a-b）

九江衛運官以外衛官俸、鈔，操、運軍月糧均不見載，或另項由屯糧支付。唯九江衛屯糧資料亦缺，僅能確定九江衛官軍俸月糧至少有2888.312兩需仰賴屯糧以外的其他收入。

附表5：九江衛官軍俸月糧額表（不全）

職稱	俸月糧銀	遇閏加銀
運官6員	共俸糧銀267.312兩	遇閏不派

[80] 吳晗，〈明代的軍兵〉，《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5.2（1937），收入《讀史箚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133。本文所引頁碼爲《讀史箚記》之頁碼。

于志嘉

經歷1員	俸13.2兩	遇閏加銀1.1兩
令典吏	共糧銀23.8兩	遇閏共加銀1.9兩
下江幫官軍	行糧銀972兩	遇閏不派
上江幫官軍	行糧銀1611兩	遇閏不派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九江府總〉6a-b。

2.南昌衛：

南昌衛屯糧據〈南昌府總〉32a，二屯共子粒米24020.629石，內前屯8908石，又樣田米88石，左屯15024.629石。內除衝崩米17.671石，餘實存屯米24002.957石。

南昌衛指揮使4員、指揮同知5員、指揮僉事12員、經歷1員、知事1員、正千戶5員、副千戶9員、已故副千戶妻1口、署所鎮撫4員、所鎮撫1員、衛鎮撫2員、正百戶10員、試百戶13員、總小旗27名、軍門旗牌8名、令史2名、典吏11名。歲支俸銀共一千餘兩、遇閏加銀一百餘兩（因未列細數又與王府官合計，不得其詳）。又，運旗散軍催運2274名，7個月月糧銀共5093.76兩。以上俱由府倉米銀10780.91兩內支應。如遇武科新中進士除授鎮撫者俸糧，及告襲千百戶各加增數目不等，俱照數於此內支用。（以上見〈南昌府總〉9b-10a）

附表6所列南昌衛運旗散軍催運以下各軍月糧共該支米20923.2石，俱由南昌衛二屯子粒米24002.957石中支用。其中，運旗散軍催運2274名、門舖常操巡捕軍禁催糧看倉正軍464名，每名照近酌議各扣船料幷軍器二項軍三料米0.9913石，該扣米2714.179石，每石徵銀4錢，該銀1085.671兩，徵銀解府，以備造船及軍器軍三料銀之用，實給各軍米18209.020石。尙餘米3079.757石（24002.957—20923.2＝3079.757），合徵貯庫，以備五年兩閏各官軍月糧支用。有餘留濟軍需。（以上見〈南昌府總〉32a-33a）

南昌衛除衛官及運軍由府倉米支付部份爲支銀外，由屯糧支付部份似仍保持以本色糧支付之形式。唯據《江西賦役全書》〈省總・屯糧〉61a，可知南昌衛屯糧亦係折銀徵收，每石4錢，共計9565.983兩。〈省總〉與〈南昌府總〉所記

南昌衛屯糧數額略有差異，若依後者則應折銀9601.182兩（0.4×24002.957＝9601.182）。南昌衛軍閏銀數不見載，僅知屯糧支付月糧後餘銀用支閏銀，再有餘則留濟軍需。而南昌衛官俸銀、閏銀之和最低亦在1100兩以上，以此補彼，取其約數，大致可得以下之數。

南昌衛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大約爲9601.182÷（9601.182＋5093.76＋1100）＝60.78% 。

附表6：南昌衛軍月糧數額表

軍役內容	人數	月糧數額	小計	附註
運旗、散軍、催運	共正軍2274名	每名除支府倉7個月，每月0.32兩外，各支屯糧5個月，每月8斗	該支米9096石、支銀5093.76兩	內每名照近酌議，各扣船料幷軍器二項軍三料米0.9913石，該扣2254.216石，徵銀解府
門舖、常操、巡捕、軍禁、催糧、看倉	共正軍464名	每名每月8斗	該米4454.4石	內每名照前扣米0.9913石，該扣米459.963石，徵銀解府
護印鄱湖正軍	共103名	每名每月8斗	該支米988.8石	
吹手、局匠、火藥、馬軍	共正軍162名	每名每月1石	該支1944石	
新改收伍運乏舊旗雜軍	13名	每名每月8斗	該米124.8石	
裁革總旗改作正軍	5名	每名每月8斗	該米48石	
紀錄軍	14名	每名每月3斗	該米50.4石	
老疾食糧軍	18名	每名每月3斗	該米64.8石	
功陞總旗	4名	每名每月1石	共支米48石	

正軍兵	165名	每名每月8斗	該米1584石	近議每季酌定分撥巡湖兵94名，每名季加米0.9石，該加米338.4石，連額共支米1922.4石
餘丁兵	200名	每名每月8斗	該米1920石	近議每季酌定分撥巡湖兵109名，每名季加0.6石，該加米261.6石，連額共支米2181.6石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南昌府總〉9b-10a、32a-33b。

3.袁州衛：

袁州衛屯田據〈袁州府總〉22a-b，原額屯田23700畝，全數由民人帶種（宜春縣1770畝、分宜縣750畝、萍鄉縣5370畝、萬載縣15810畝）。計每分30畝，每畝該米0.2石，共該米4740石。內本色米2370石，屯官徵收府倉，候給官軍俸月糧。折色米2370石，每石折銀4錢，共銀948兩；外餘糧銀52.122兩，屯官徵解府庫，候給各官軍俸月糧。王毓銓氏據此謂「江西各衛屯糧，在那時幾乎全部改折徵銀，只袁州一衛本、折兼半」。[81] 但〈袁州府總〉6b謂袁州衛屯糧本色米2370石，每石俱以4錢約算，該銀948兩。總計本折色米及餘糧銀共1948.122兩。

袁州衛官軍應歲支銀7296.868兩，合三年攤閏銀每年該銀202.690兩，共歲支銀7499.559兩。先儘支屯糧折銀1948.122兩，不足，由府倉米6858.833兩內找支。（見〈袁州府總〉6b-9b）

袁州衛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948.122÷7499.559＝25.97% 。

附表7：袁州衛官軍俸鈔月糧額表

職稱	歲支俸銀	歲支鈔銀	遇閏加俸銀	遇閏加鈔銀	附註
指揮使	37.8兩	7.2兩	3.15兩	0.6兩	

[81]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162。

署指揮使	28.08兩	5.3484兩	2.34兩	0.4457兩	近本官降俸少支，應存原額
指揮同知3員	28.08兩	5.3484兩	2.34兩	0.4457兩	
署指揮同知	25.92兩	4.9368兩	2.16兩	0.4114兩	
指揮僉事6員	25.92兩	4.9368兩	2.16兩	0.4114兩	
署指揮僉事	17.28兩	3.29112兩	1.44兩	0.27426兩	
納級指揮僉事	8.1兩	0.9兩	0.675兩	0.075兩	
正千戶3員	17.28兩	3.29112兩	1.44兩	0.27426兩	
副千戶4員	17.28兩	2.77704兩	1.44兩	0.23142兩	
百戶14員	16.2兩	1.8兩	1.35兩	0.15兩	
衛鎮撫	17.28兩	2.77704兩	1.44兩	0.23142兩	
試百戶2員	8.1兩	0.9兩	0.675兩	0.075兩	
所鎮撫2員	12.96兩	1.3371兩	1.08兩	0.1113兩	
令史2名	歲支銀1.62兩	0.4371兩	遇閏各加銀0.135兩	0.0363兩	
典吏11名	歲支銀1.62兩	0.18兩	遇閏各加銀0.135兩	0.015兩	
正軍1050名		0.051428兩		0.0042856兩	
銅鼓石軍人10名		每名歲支行糧銀2.88兩		遇閏各加銀0.24兩	
運糧旗軍幷催運軍伴共1269名		每名歲支月糧銀3.84兩		遇閏各加銀0.32兩	本府給發，解赴水次
存衛操備軍人373名		每名歲支糧銀3.84兩		遇閏各加銀0.32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袁州府總〉6b-9b。

4.贛州衛：

贛州衛屯糧據〈贛州府總〉25b，每年共屯田子粒米15913.877石，約該銀6365.555兩。

除總小旗軍月糧閏銀不載，衛官鈔銀另額支給，不在府倉米內支付，致不詳其額外，應歲支銀7310.132兩，合三年攤閏銀每年該銀兩67.604兩，共歲支銀7377.736兩。

贛州衛衛官經歷、知事以上俸銀、鈔銀、閏俸、閏鈔，衛令史吏糧銀、遇閏加派，總小旗軍月糧等共銀7377.736兩。先儘屯糧銀6365.555兩內支用外，不足1012.181兩，由府倉米1286.489兩幷南安府屬協濟銀1291兩內湊支。餘銀留備軍旗等閏月支用。（以上見〈贛州府總〉6b-8a）

設旗軍閏銀與衛官鈔銀爲 α ，則贛州衛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 $6365.555 \div (7377.736 + \alpha) = 86.28\% - \beta$ 。

附表8：贛州衛官軍俸鈔月糧銀額表

職稱	人數	俸銀	鈔銀	遇閏加銀
指揮使	5員	各42兩，共俸210兩	各10.08兩，共鈔50.4兩	指揮使、同、僉共15員，共閏俸鈔52.204兩
指揮同知	3員	各31.2兩，共俸93.6兩	各7.488兩，共鈔22.464兩	
指揮僉事	7員	各28.8兩，共俸201.6兩	各6.912兩，共鈔48.384兩	
正、副千戶幷衛鎮撫	共20員	各19.2兩，共俸384兩	各4.068兩，共鈔81.36兩	千・百戶、經歷、知事共43員，共閏俸鈔70.3542兩

署副千戶幷實授百戶	13員	各18兩，共俸234兩	各2.52兩，共鈔32.76兩	
所鎮撫	1員	俸14.4兩	鈔2.016兩	
試百戶	6員	各9兩，共俸54兩	各1.26兩，共鈔7.56兩	
署試百戶	1員	俸6兩	鈔0.18兩	
衛經歷		俸12.6兩	鈔1.764兩	
知事		俸12兩	鈔1.62兩	
衛令史六房及鎮撫司五所吏	共12名	各2.112兩，共銀25.344兩		共閏2.112兩
總小旗	20名	共115.2兩		閏銀不載
操軍	940名	各3.84兩，共銀3609.6兩		閏銀不載
無妻新軍	3名	各2.4兩，共7.2兩		有無閏銀不詳
紀錄軍人	57名	各1.44兩，共銀82.08兩		閏銀不載
運軍	625名	各3.2兩，共2000兩		閏銀不載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贛州府總〉6b-8b。

5.信豐所：

信豐所屯糧據〈贛州府總〉25b，共屯田子粒米4277.8石，該銀1711.12兩；外餘糧銀162.747兩。

信豐所千百戶共11員，春夏二季共支銀102兩。總小旗、旗軍、紀錄、餘丁共541名，共支銀2028.48兩。總計2130.48兩，由屯糧1711.12兩，寧、雩、興三縣協濟信豐倉米銀2205兩內支給。餘銀1785.64兩，聽備官軍閏月支用。

千百戶秋冬二季銀由信豐所屯田餘糧銀162.747兩內支給。

又，信豐所旗軍543名，每年二個月月糧共339.546兩，由縣倉米銀533.219兩中支給。（以上見〈贛州府總〉8a-b、〈信豐縣〉4b-5a）

假設信豐所千百戶秋冬二季銀亦爲102兩，官軍遇閏加銀爲α，則信豐所官軍

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711.12＋162.747）÷（102＋2130.48＋339.546＋α）＝72.85% －β。

6.會昌所：

會昌所屯糧據〈會昌縣〉11b，每年屯糧子粒米4785.9石；但〈贛州府總〉25b作4740.32石，該銀1896.128兩。

會昌所千百戶11員、司吏1名，共支銀196.8兩。總小旗、正軍、紀錄、餘丁共714名，歲該支銀2417.28兩。總計2614.08兩，由屯糧1896.128兩，興、石、龍、定四縣協濟會昌倉米銀1506兩內支給。餘銀788.048兩，聽備官軍閏月支用。（以上見〈贛州府總〉8b、25b）

設官軍閏銀爲α，則會昌所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896.128÷（2614.08＋α）＝72.53% －β。

7.吉安所：

吉安所屯糧據〈吉安府總〉27a-b，共屯田子粒米2265.774石，每石折銀4錢，共銀906.309兩，聽操軍月糧支用。

吉安所官軍月糧總額7852.08兩，由吉安府倉米折銀1583.511兩（內廬陵派府倉米每石折銀5錢，共銀1394.511兩；泰和協永新改出189兩）、萬載縣協濟銀1574兩、吉安所額派屯米銀906.309兩、清江、新喻、新淦、峽江、萬載五縣協濟倉米共銀3730兩，連前共倉米屯米幷協濟共銀7793.801兩內支用。又除銀189兩改永新所湊給官軍月糧，儘數額外實少銀247.259兩，于前府倉麥米餘銀內湊給。（以上見〈吉安府總〉10a-b、〈廬陵縣〉10a）

吉安所官軍遇閏似不派銀。其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906.309÷7852.08＝11.54% 。

又，所謂協濟銀，據〈萬載縣〉8a、〈清江縣〉8a-b、〈新喻縣〉8a、〈新淦縣〉9b、〈峽江縣〉8a，萬載縣協濟吉安府倉米4250石，每石折銀5錢，該銀2125兩。內551兩解司，湊給吉安所運軍月糧，又1574兩解吉安府，支給該所操軍月糧。清江縣協濟吉安府倉米978石，折銀489兩；新喻縣協濟吉安府倉米

2797石，折銀1398.5兩；新淦縣協濟吉安府倉米1871石，折銀935.5兩；峽江縣協濟吉安府倉米712石，折銀356兩，俱解司支給吉安所運糧官軍。可知運軍月糧係由司支放，操軍月糧則由府支放。

附表9：吉安所官軍糧銀表

職稱	支銀	共銀	職稱	支銀	共銀
指揮1員	31.2兩	31.2兩	正千戶3員	19.2兩	57.6兩
副千戶5員	19.2兩	96兩	百戶3員	18兩	54兩
實授鎮撫1員	14.4兩	14.4兩	試鎮撫1員	9兩	9兩
司吏	1.8兩	1.8兩	操練舍健旗軍共815名	3.84兩	3129.6兩
幼軍12名	1.44兩	17.28兩	運軍1150名	3.84兩	4416兩
又增設所鎮撫1員	18兩	18兩	試鎮撫1員	7.2兩	7.2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吉安府總〉10a-b。

8.安福所：

安福所屯糧據〈吉安府總〉27a，共子粒米3318石，每石折銀4錢，共銀1327.2兩，給安福所操軍。但〈安福縣〉21a謂安福所屯糧係用以兌給安福所操、運旗軍秋冬二季月糧，應以後說爲是。

安福所運糧軍月糧由泰和縣協濟永新倉米改解司（每石折銀5錢）銀554.5兩、永寧縣協濟永新倉改解安福縣倉米銀258兩、吉水縣協濟安福縣倉米銀1100兩、永豐縣協濟安福縣倉米銀127.5兩解司支放（以上見〈泰和縣〉9b-10a、〈永寧縣〉6b、〈吉水縣〉8a、〈永豐縣〉9a）。

安福所官吏俸鈔銀、在所旗軍部份月糧銀、遇閏加銀由安福縣倉米（每石折銀5錢）銀1941.160兩內支給。通共歲支俸鈔月糧銀1397.470兩，合三年攤閏銀每年該銀38.818兩，共歲支銀1436.289兩。遇缺扣報，餘銀504.870兩，存縣正支。（見〈安福縣〉8b-9a）

假設安福所屯糧全數用支操運軍月糧，則安福所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327.2÷（1436.289＋1327.2）＝48.02% 。

附表10：安福所官軍俸鈔月糧額表

職稱	俸鈔銀	遇閏加銀	職稱	俸鈔銀	遇閏加銀
指揮1員	23.808兩	1.984兩	副千戶3員	23.088兩	1.9073兩
百戶5員	20.52兩	1.71兩	試百戶2員	10.26兩	0.855兩
鎮撫1員	16.416兩	1.368兩	吏目1員	13.08兩	1.09兩
所吏1名	2.052兩	0.171兩	旗軍在所526名	每名歲抵該所屯米外，應給縣倉米銀2.1858兩，該銀1149.730兩	0.1021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安福縣〉8b-9a。

9.永新所：

永新所屯糧據〈吉安府總〉27b，原額子粒本色正米3519石，每石折銀3錢，共銀1055.7兩，聽操軍支作月糧。但據〈永新縣〉20a-b，徵完聽支操運旗軍作月糧。應以後者爲是。

永新所管運官2員俸糧、運軍410名・書伴吹手16名月糧，由永新縣府倉米（每石折銀5錢）銀189兩奉文改作協濟永新所倉米、永新縣協濟安福倉米改存本縣倉米銀1215.5兩解司支放。

永新所內除運官以外各官吏俸銀、遇閏加俸、操正軍、老幼軍6個月月糧、遇閏加給半個月，俱由永新縣倉米（每石折銀5錢）銀1620.585兩內支給。

永新所官軍鈔銀向來解府另給、吏目鈔銀例於鹽鈔內解府另給。

永新所操正軍、老幼軍6個月月糧，遇閏加給半個月；運軍、書伴、吹手2個月月糧；鎮守萬安營餘丁12個月月糧、遇閏加給1個月，俱由屯田子粒銀1055.7兩聽支。共支去額銀954.72兩，應剩額銀100.98兩。遇閏共該支銀62.52兩，五年兩閏，共該支閏銀125.04兩。每年應於剩存額銀100.98兩內，預扣存銀25.008兩，五年共存銀125.008兩，抵準五年兩閏支數外，每年尙應剩額徵屯銀75.972

兩，依限解貯縣庫，聽詳支用。幷另給新僉運旗，以濟漕運造船之苦。如該所奉有問發新軍，即以操軍內不等缺支應存屯月糧銀照數給養。或數支不敷，費出不已，聽請詳明文另行設處。其操軍餘丁每年應給屯糧，照限解縣，親詣千戶所點名散給。毋得含糊私兌，各軍餘仍具冊結領狀，附卷查盤。（以上見〈永新縣〉8b-又9b）

假設永新所官軍鈔銀爲α，運官赴司支領糧額與其他同級衛所官同，運軍、書伴、吹手赴司支領的十個月份糧爲每名每月8斗，每斗以4分折算，遇閏由使司加給一個月，每名0.32兩，則永新所官軍歲支俸月糧爲3534.48兩，遇閏加銀300.22兩，五年兩閏，每年攤閏銀120.088兩，計歲支銀3654.568兩。而永新所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055.7÷（3654.568＋α）＝28.88% $-\beta$。

附表11：永新所官軍俸月糧額表

職稱	俸銀	遇閏加俸
指揮2員	各28.8兩，共57.6兩	各2.4兩，共4.8兩
正、副、納級千戶9員，內每年例有1員管運，赴使司領糧外，實在8員	各19.2兩，共153.6兩	內除1員管運使司加給外，遇閏各加1.6兩，共加12.8兩
百戶9員，內每年例有1員管運，赴使司領糧外，實在8員	各18兩，共144兩	內除1員管運使司加給外，遇閏各加1.5兩，共加12兩
吏目1員	12兩	1兩
操正軍420名	每名縣給6個月月糧，每月該米8斗，每斗以4分折算，各該月糧銀1.92兩，共銀806.4兩☆每名所給屯米6個月，每月8斗，每斗以3分折算，各該銀1.44兩，共銀604.8兩	遇閏縣給半個月，每名加銀0.16兩，共加銀67.2兩☆遇閏每名所給半個月屯糧，各該加銀0.12兩，共加銀50.4兩

老幼軍8名	每名縣給6個月月糧，每月該米3斗，每斗以4分折算，各該月糧銀0.72兩，共銀5.76兩☆每名所給屯米6個月，每月3斗，每斗以3分折算，各該銀0.54兩，共銀4.32兩	遇閏縣給半個月，每名加銀0.06兩，共加銀0.48兩☆遇閏每名所給半個月屯糧，各加銀0.045兩，共加銀0.36兩
運軍410名，書伴、吹手16名，共426名	赴使司領糧（十個月，設爲每月8斗，每斗以4分折算，各該銀3.2兩，共銀1363.2兩）。另每名補給屯米2個月，每月8斗，每斗以3分折算，各該補銀0.48兩，共銀204.48兩	由使司加給，數額不詳（假設遇閏每名俱於使司全支一個月，各該加銀0.32兩，共加銀136.32兩）
鎮守萬安營餘丁49名	每年照依於420名操正軍戶下挨僉精壯餘丁，輪流更撥，循環鎮守。每名每月應食本所屯米8斗，每斗以3分折算，12個月各該銀2.88兩，共銀141.12兩	遇閏每名俱於所屯糧全支一個月，各該加銀0.24兩，共加銀11.76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永新縣〉8b-又8b、又9a-b。

10.龍泉守禦百戶所：

龍泉所屯糧據〈吉安府總〉27a，屯糧子粒米354石，每石折銀4錢，共銀141.6兩。

龍泉百戶所官俸向在贛州衛支領。百戶所旗軍月糧由屯糧子粒銀141.6兩，及龍泉縣倉米（每石折銀5錢）銀487.698兩內支用。已上俱遇缺扣報。（見〈龍泉縣〉8a）

龍泉百戶所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不詳。

11.饒州所：

饒州所屯糧據〈饒州府總〉27b-28a，幷餘糧在內共折銀1126.039兩；又建德縣民佃屯糧折銀1001.032兩，二項合計共2127.071兩。但〈饒州府總〉8a「饒

州府倉米」項下不列餘糧，是否屯田餘糧不需繳送府倉？或不被算入屯米支給官軍？不詳。

饒州所官軍應歲支銀5548.08兩，合三年攤閏銀每年該銀154.113兩，共歲支銀5702.193兩。

其所官俸銀、閏俸，操運軍月糧銀、遇閏加銀，俱先儘支屯米（千戶所屯糧折銀1010.943兩，又建德縣佃子粒折銀1001.032兩），不足3690.218兩（若屯田餘糧亦用以支付官軍月糧，則不足3575.122兩），由府倉米1276.303兩連前府倉麥米10889.136兩內支給。（〈饒州府總〉7b-9a）

〈饒州府總〉未列饒州所官鈔銀及閏鈔數，不知何故。去除這些項目不計，饒州所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010.943＋1001.032）÷5702.193＝35.28% 或2127.071÷5702.193＝37.30% 。

附表12：饒州所官軍俸月糧銀表

職稱	人數	俸銀	閏俸	職稱	人數	俸銀	閏俸
指揮同知	1員	28.8兩	2.4兩	指揮僉事、正副千戶	10員	19.2兩	1.6兩
署副千戶4員、百戶5員、鎮撫1員	共10員	18兩	1.5兩	試百戶	5員	9兩	0.75兩
冠帶總旗	2員	6兩	0.5兩	吏目	1員	12兩	1兩
吏	1名	1.8兩	0.15兩	操運軍	1322名	每名月糧銀3.84兩	0.32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饒州府總〉7b-9a。

12.廣信所：

廣信所屯田據〈廣信府總〉6b、23a-b，共有756分，額徵屯糧正耗米4536.865石，折銀1814.746兩；又陞科輕齎銀0.622兩。屯糧由管屯官徵完，運赴廣濟倉上納，支給軍糧；銀解府貯庫。

廣信所官軍應歲支銀6149.352兩，合三年攤閏銀每年該銀146.683兩，共歲支銀6296.035兩。

其所官俸鈔銀、閏俸、閏鈔，廣信所操運軍月糧銀、遇閏加銀，廣信所運軍行糧銀，例不支閏，俱由屯糧子粒折銀1814.746兩儘支外，尚該找支府米銀4481.289兩，由府倉米（972.576兩）幷大各祿改抵府倉米銀（3946兩）項下支用。（〈廣信府總〉6b-8b）

廣信所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814.746÷6296.035＝28.82% 。

附表13：廣信所官軍俸鈔月行糧銀表

職稱	人數	俸銀	鈔銀	閏俸	閏鈔
正千戶	3員	19.2兩	4.608兩	1.6兩	0.384兩
署副千百戶	8員	18兩	2.52兩	1.5兩	0.21兩
試百戶	1員	14.4兩	2.016兩	1.2兩	0.168兩
所司吏	1名	1.8兩	0.252兩	0.15兩	0.021兩
副千戶	5員	19.2兩	3.888兩	1.6兩	0.32兩
操守運旗軍	1279名	每名月糧銀3.84兩		加閏0.32兩	
運軍		行糧銀共868.5兩		例不支閏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廣信府總〉6b-8b。

13.鉛山所：

鉛山所屯田據〈廣信府總〉23b，共有730分，額徵屯糧正耗米4445.7石，奉例每石折銀4錢，該銀1778.28兩；又新增折銀100.8兩，二項共銀1879.08兩。由管屯官徵完，解貯鉛山縣庫，支給所軍月糧。

鉛山所官軍應歲支銀4428.012兩，合三年攤閏銀每年該銀101.717兩，共歲支銀4529.729兩。

其中，所官鈔銀、閏鈔，係由廣信府倉米幷大各祿改抵府倉米銀4918.576兩內支給。所官俸銀、閏俸，總小旗、哨隊長、操運軍月糧，運官、旗軍行糧銀

等則是由屯糧正耗米銀1879.08兩內先儘支給。不足者由鉛山縣倉米銀701.320兩及玉山、永豐、弋陽、貴溪、興安、東鄉各縣協濟鉛山縣倉米銀共2660.999兩內支給。

所官中有優給未食俸者，其俸銀扣報，循環至下年度支放。另鉛山縣存縣本縣庫鈔518錠3貫378文，該銀12.966兩，貯縣聽鉛山所糧餉、軍三等用。（〈廣信府總〉8a-b、23b、〈鉛山縣〉4b、8b-9b、21b）

鉛山所官軍俸月糧由屯糧支付的比例是1879.08÷4529.729＝41.48% 。

附表14：鉛山所官軍俸鈔月行糧額銀表

職稱	人數	俸銀	鈔銀	閏俸	閏鈔
正千戶	1員		4.608兩		0.384兩
正千戶	4員	19.2兩		1.6兩	
副千戶	6員		3.888兩		0.324兩
納級副千戶	3員	18兩		1.5兩	
百戶	1員	18兩	2.52兩	1.5兩	0.21兩
鎮撫	1員	＊＊14.4兩？	2.016兩	2.85兩？	0.168兩
優給正千戶舍人	1名	19.2兩	4.608兩	1.6兩	0.384兩
優給百戶舍人	1名	18兩	2.52兩	1.5兩	0.21兩
吏目		12兩	1.08兩	1兩	0.09兩
柴薪		24兩		例不派閏	
司吏	1名	1.8兩	0.252兩	0.15兩	0.021兩
總小旗、哨隊長、操運軍	共882名	每名月糧銀3.84兩		0.32兩	
運官、旗軍	508員名	每員名支行糧銀1.5兩			

＊資料來源：《江西賦役全書》〈廣信府總〉6b-8b、〈鉛山縣〉8a-9b。

＊＊鎮撫俸銀及閏俸數額不載，但〈鉛山縣〉9b謂所官軍三年攤閏銀100.58兩，共所官軍應歲支銀4487.66兩，較上表所列各項總額多了15.35兩，閏俸額則多了0.95兩。因此暫定鎮撫俸銀爲（15.35－0.95＝）14.4兩，閏俸（0.95×3＝）2.85兩。

以上的討論經整理可成下表。

附表15：萬曆末年江西衛所屯糧供軍比例表

南昌衛	60.78%	袁州衛	25.97%	贛州衛	86.28% －β	信豐所	72.85% －β
會昌所	72.53% －β	吉安所	11.54%	安福所	48.02%	永新所	28.88% －β
饒州所	37.30%	廣信所	28.82%	鉛山所	41.48%		

供軍比例在50% 以上的僅有南昌衛、贛州衛、信豐所、會昌所等四衛所，不足三成的則有袁州衛、吉安所、永新所、廣信所等四衛所。屯糧供軍比例的多寡對衛所官軍俸月糧額是否會產生影響？萬曆末年衛所官軍俸月糧額較萬曆以前有何變化？本節以下要探討的，就是這些問題。

在討論衛官俸額之前，首先要瞭解武官資格。明代衛所武官資格爲指揮使正三品、指揮同知從三品、指揮僉事正四品、衛鎮撫從五品、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所鎮撫從六品、百戶正六品。永樂十五年以後百戶、所鎮撫有試職，作一級，支半俸。另外，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試百戶、試所鎮撫各有署職。凡署職遞加本職一級，署副千戶以實授百戶，署試百戶、試所鎮撫俱以冠帶總旗。署職起自景泰元年，作半級，不支俸。[82] 武官歲支俸米曰祿，正三品月支祿米35石，歲該420石；從三品月支祿米26石，歲該312石；正四品月支祿米24石，歲該288石；正五品月支祿米16石，歲該192石；從五品月支祿米14石，歲該168石；正六品月支祿米10石，歲該120石；從六品月支祿米8石，歲該96石。[83] 萬曆《大明會典》卷三十九，〈戶部・廩祿・俸給〉謂：

> 武職府衛官俸級視文職。惟本色米折銀例每石二錢五分，其月米、折絹布鈔俱與文職同。

同卷記「官員俸給」，謂：

---

[82] 萬曆《大明會典・兵部・銓選・官制》118：2a-3a，本文只討論都司以下衛所官的部份，故有關武官資格的介紹亦限於衛所以下。

[83] 萬曆《大明會典・兵部・銓選・勳祿》118：3b-5a。

凡官員俸給，有本色，有折色。本色三：曰月米，每月一石；曰折絹米，歲兩月；曰折銀米，歲十月。後定絹一疋折銀七錢。折色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後又分上下半年之例，上半年支本色鈔錠，下半年以胡椒、蘇木折鈔關支。後又以綿布折支，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疋。後又定布一疋，折銀三錢。其本色鈔錠不敷，或將贓罰、廣盈等庫附餘綾羅絹布衣物等件折支。先後事例不一。

其下開列事例，如文職正三品爲：

歲該俸四百二十石。內本色俸一百四十四石，折色俸二百七十六石。本色俸內除支米一十二石外，折銀俸一百一十石，折絹俸二十二石，共該銀八十四兩七錢。折色俸內，折布俸一百三十八石，該銀四兩一錢四分；折鈔俸一百三十八石，該本色鈔二千七百六十貫。

如此算來，正三品的文官每年應支米12石、銀88.84兩、鈔2760貫。[84] 準此，再將正三品以下衛所官俸糧整理後可得附表16。

附表16：明代衛所官俸糧表

	正三品	從三品	正四品	從四品	正五品	從五品	正六品	從六品
歲俸	420石	12石	288石	252石	192石	168石	120石	96石
本色俸：	144石	111.6石	104.4石	93.6石	75.6石	68.4石	66石	56.4石
1.月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2.折銀俸	110石	83石	77石	68石	53石	47石	45石	37石
2該銀	27.5兩	20.75兩	19.25兩	17兩	13.25兩	11.75兩	11.25兩	9.25兩
3.折絹俸	22石	16.6石	15.4石	13.6石	10.6石	9.4石	9石	7.4石
3該銀	7.7兩	5.81兩	5.39兩	4.76兩	3.71兩	3.29兩	3.15兩	2.59兩
2＋3共該銀	35.2兩	26.56兩	24.64兩	21.76兩	16.96兩	15.04兩	14.4兩	11.84兩
折色俸：	276石	200.4石	183.6石	158.4石	116.4石	99.6石	54石	39.6石

[84] 萬曆《大明會典・户部・廩祿・俸給》39：3a-5b。

4.折布俸	138石	100.2石	91.8石	79.2石	58.2石	49.8石	27石	19.8石
4該銀	4.14兩	3.006兩	2.754兩	2.376兩	1.746兩	1.494兩	0.81兩	0.594兩
5.折鈔俸	138石	100.2石	91.8石	79.2石	58.2石	49.8石	27石	19.8石
5該本色鈔	2760貫	2004貫	1836貫	1584貫	1164貫	996貫	540貫	396貫

＊資料來源：萬曆《大明會典・户部・廩祿・俸給》39：3a-5b。

上表中，折銀俸以每石0.25兩計；折絹俸以每俸糧二石折絹一疋（詳下《萬曆會計錄》），每絹一疋折銀0.7兩計；折布俸則比照文職，每200貫折布一疋，每布一疋折銀0.3兩。另外，《萬曆會計錄》卷三十七，〈營衛官軍俸糧〉內有「五軍都督府幷京衛武官俸糧則例」，將指揮使以下衛所官俸糧整理後可成下表。

附表17：萬曆初五軍都督府幷京衛武官俸糧則例

	指揮使	指揮同知	指揮僉事	正千戶	副千戶衛鎮撫	實授百戶	所鎮撫	試百戶	署試百戶
歲俸	420石	312石	288石	192石	168石	120石	96石	60石	36石
本色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12石
折銀米	110石	83石	77石	53石	47石	45石	37石	20石	10石
該銀	27.5兩	20.75兩	19.25兩	13.25兩	11.75兩	11.25兩	9.25兩	5兩	2.5兩
折絹米	22石	16.6石	15.4石	10.6石	9.4石	9石	7.4石	4石	2石
該銀	7.7兩	5.81兩	5.39兩	3.71兩	3.29兩	3.15兩	2.59兩	1.4兩	0.7兩
折布米	138石	100.2石	91.8石	58.2石	49.8石	27石	19.8石	12石	6石
該銀	4.14兩	3.006兩	2.754兩	1.746兩	1.494兩	0.81兩	0.594兩	0.36兩	0.18兩
歲共折銀	39.34兩	29.566兩	27.394兩	18.706兩	16.534兩	15.21兩	12.434兩	6.76兩	3.38兩
折鈔米	138石	100.2石	91.8石	58.2石	49.8石	27石	19.8石	12石	6石
該鈔	2760貫	2004貫	1836貫	1164貫	996貫	540貫	396貫	240貫	120貫

＊資料來源：《萬曆會計錄・營衛官軍俸糧》37：2b-5b。

顯然，京衛武官的俸糧數額是完全符合會典規定的。[85] 而「五軍都督府幷京衛武官俸糧則例」對武官各俸支領情形所作的說明，更可補充會典敘述的不足。其言謂：

> 以上各官俸糧，本色米每月隨軍士月糧關支，折銀米每年拾個月，每石折銀貳錢伍分，於內承運庫關支。折絹米夏季肆月、伍月，每俸貳石，准絹壹疋，每疋折銀柒錢；上半年陸個月折鈔，每俸壹石，折本色鈔貳拾貫；下半年陸個月折布，每俸壹石，折鈔貳拾貫，每鈔貳百貫，准布壹疋，每疋折銀參錢。本色鈔於內庫關支，折絹布銀俱於太倉銀庫關支。

由此可知，萬曆會典所載文武官各俸折銀數正是萬曆初年的折銀數；而在萬曆初，至少在京衛所武官支領的俸糧仍是米、銀、鈔三種形態同時並存的。相形之下，萬曆末年江西衛所武官俸糧支領的情況就益發顯出其特別之處。上文引《江西賦役全書》介紹過江西都司各衛所官旗俸鈔銀額，整理後可得附表18。

附表18：江西都司各衛所官旗俸鈔銀額比較表

	袁州衛(俸/閏俸鈔/閏鈔)	贛州衛(俸/閏俸鈔/閏鈔)	吉安所(俸)	安福所(俸鈔合計/閏俸鈔)	永新所(俸/閏俸)	饒州所(俸/閏俸)	廣信所(俸/閏俸鈔/閏鈔)	鉛山所(俸/閏俸鈔/閏鈔)
指揮使	37.8/3.15 7.2/0.6	42/？ 10.08/？						
指揮同知 署指揮使	28.08/2.34 5.3484/ 0.4457	31.2/？ 7.488/？				28.8/2.4		

[85] 川越泰博，〈『大明會典』にみえる明代衛所官の月糧額をめぐって〉，《汲古》15（1989）：37-42質疑會典中有關衛所武官月糧額的記載與事實不符，是因爲未注意到武官俸糧除本色俸與折色俸的基本區分外，其下更細分爲月米、折銀俸、折絹俸、折布俸與折鈔俸等不同項目，且各項目折銀率本就不同所致。另外，同級文、武官俸額雖同，但因文、武官「折銀俸」的折銀率不同，實際支領的俸糧額數仍有差異。折銀率的多寡可能因時而異，亦不無可能因地而異，這就需要累積區域史研究的成果來加以證明。

于志嘉

指揮僉事 署指揮同知	25.92/2.16 4.9368/ 0.4114	28.8/？ 6.912/？				19.2/1.6		
指揮			31.2	23.808/ 1.984	28.8/2.4			
正千戶 署指揮僉事	17.28/1.44 3.29112/ 0.27426	19.2/？ 4.068/？	19.2		19.2/1.6	19.2/1.6	19.2/1.6 4.608/ 0.384	19.2/1.6 4.608/ 0.384
署指揮僉事								
副千戶	17.28/1.44 2.77704/ 0.23142	19.2/？ 4.068/？	19.2	23.088/ 1.9073	19.2/1.6	19.2/1.6	19.2/1.6 3.888/ 0.32	
納級副千戶					(19.2/1.6)			18/1.5 3.888/ 0.324
衛鎮撫	17.28/1.44 2.77704/ 0.23142	19.2/？ 4.068/？				18/1.5		
百戶	16.2/1.35 1.8/0.15	18/？ 2.52/？	18	20.52/1.71	18/1.5	18/1.5	18/1.5 2.52/0.21	18/1.5 2.52/0.21
署副千戶		18/？ 2.52/？				18/1.5	18/1.5 2.52/0.21	
試百戶	8.1/0.675 0.9/0.075	9/？ 1.26/？		10.26/ 0.855		9/0.75	14.4/1.2 2.016/ 0.168	
納級指揮 僉事	8.1/0.675 0.9/0.075							

所鎮撫	12.96/1.08 1.3371/ 0.1113	14.4/？ 2.016/？	實授鎮撫 1員14.4 增設所鎮 撫1員18	16.416/ 1.368				14.4/ 2.85？ 2.016/ 0.168
試所鎮撫			試鎮撫 1員9 增設試鎮 撫1員7.2					
署試百戶		6/？ 0.18/？						
吏目				13.08/1.09	12/1	12/1		12/1 1.08/0.09
令史	1.62/0.135 0.4371/ 0.0363	2.112/？						
典吏、司吏、所吏	1.62/0.135 0.18/0.015	2.112/？	1.8	2.052/ 0.171		1.8/0.15	1.8/0.15 0.252/ 0.021	1.8/0.15 0.252/ 0.021
冠帶總旗						6/0.5		

附表18顯示的第一個問題，是對所謂「俸銀」與「鈔銀」的解釋。從會典中所載武官俸糧的項目，推想《江西賦役全書》中所謂的「俸銀」，大概包括了月米、折絹米及折銀米等原屬本色的部份，所謂「鈔銀」或指本色鈔及絹布折鈔等原屬折色各部份。這些部份除月米一項定支本色外，其他各部份的折銀數本來各有規定，未必能反映實際市場價格。但萬曆末年江西衛所官似乎連月米一項都改折支銀，若果如此，由於所有支出都要仰賴有限的俸銀，月米折銀數如果較實際米價偏低，武官實質收入將大爲減少。明代米價據全漢昇氏指出，在

萬曆十七(1589)年的松江，每石需銀1.6兩；而整個江南地方的平均米價，大約維持在每石0.94兩左右。鈔價則在嘉靖八(1529)年時爲每兩銀換1250貫，至嘉靖十九(1540)年前後每兩銀約可換到10000貫以上。[86] 如果萬曆末江西衛所官「俸銀」中包括了月米，顯然其折銀率相較於實際米價是過低的，但這一部份在折色鈔的折銀數上得到若干補償。不過，萬曆末江西衛官俸糧額數究竟如何算出已無從得知，「鈔銀」的性質亦不是很清楚，許多衛所或缺鈔銀資料或載明「向來解府另給」。以上只能指出其特色，作爲日後比較研究之基礎。

附表18另一點引人注目的是同官不同俸的情形。特別是袁州衛，各級官俸銀與閏俸之和甚至低於贛州衛同級官俸銀額數，其鈔銀與閏鈔之和亦低於贛州衛同級官鈔銀之額。又如吉安所，有實授鎮撫1員，歲支銀14.4兩，試鎮撫1員，歲支銀9兩；又增設所鎮撫1員，歲支銀18兩，試鎮撫1員，歲支銀7.2兩。關於後者，《萬曆會計錄》卷二十七，〈寧夏鎮・俸糧・俸給則例〉在陳述各級官俸糧額數之後說到：

中間有品級同，俸不同，係比試未中及衰老減支。

這個解釋應能適用於吉安所。至於前者，問題就不是這樣單純。顯然，袁州衛官俸糧偏低的情形是全衛性的。這種現象的產生似乎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考慮。其一是衛所屯糧供軍比例的多寡。上文提過，袁州衛屯糧供軍比例僅25.97%，贛州衛則爲86.28% $-\beta$，劣勢的屯糧供軍比例確實很有可能是影響袁州衛官俸糧偏低的最大因素。另一種可能則是受到各地方財政狀況優劣的影響。這一點在下文討論各衛所軍月糧額時還會再加闡述，但在比較贛州衛與袁州衛官俸糧時並不適用。因爲相對於袁州府倉米的不假外求，贛州府的府倉米銀甚至需要南安府屬各縣倉米協濟，顯示其地方財政狀況絕非良好。不過，贛州衛官俸額雖高於袁州衛，與其他各所相較，只能說是維持在基本線上，並未因其屯糧供軍比例居各衛之冠而提高俸額，這也許可以看作是受到地方財政狀況影響的另一種表現。

附表18顯示的第三個特色，是衛所官俸級的簡化。如贛州衛正、副千戶、衛

[86] 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新亞學報》8.1（1967）：164-5，173。

鎮撫俱爲俸19.2兩，鈔4.068兩；饒州所署副千戶4員、百戶5員、鎮撫1員，俱歲支俸銀18兩，閏俸1.5兩等等都是。正、副千戶俸、鈔銀額完全一致的情形僅見於贛州衛，其他如袁州衛、廣信所皆以鈔銀多寡來區分二者。即使如此，與附表17相較，正、副千戶俸銀一元化的現象仍是值得注意的。萬曆初年在京衛所的正千戶、副千戶（＝衛鎮撫）、實授百戶、所鎮撫、試百戶、署試百戶的俸糧不但各不相同，而且因爲各官所領取的俸糧除月米一項外，所有各項額數均不相同，因此各級官所支領的銀、鈔額數也是各不相同的。江西地區武官俸級的簡化不知始於何時，但從附表19所錄正德《饒州府志》中有關正德間饒州所官俸米的記錄來看，至少到正德年間，即使在饒州所各級武官官俸仍維持了中央所定的標準，正、副千戶、百戶、鎮撫是各成一級的。[87]

附表19：正德間饒州所官俸米表

職稱	人數	每員歲給俸米	職稱	人數	每員歲給俸米
正千戶	無定員	192石（月16石）	副千戶	無定員	168石（月14石）
鎮撫	1員	90石（月7.5石）＊＊	百戶	10員	120石（月10石）
吏目	1員，文臣爲之	36石（月3石）			

＊資料來源：正德《饒州府志・公署・饒州守禦千户所》2：6a。

＊＊90石疑爲96石之誤。

地方財政狀況對衛所官軍收入的影響，在觀察江西都司各衛所軍月糧額數時表現得特別明顯。

[87] 萬曆以前官軍俸糧額數另見於弘治《撫州府志》，由於《江西賦役全書》缺撫州所的資料，故亦附記其資料如下。

職稱	人數	糧額	職稱	人數	糧額	職稱	人數	糧額
正千户	5員	月俸16石	副千户	2員	月俸14石	百户	7員，舊11員	月俸10石
鎮撫	1員	月俸8石	吏目	1員	月俸5石	司吏	1名	月糧1石
旗軍	1091名	月糧1石						

＊資料來源：弘治《撫州府志・職制・祿秩》16：13b-14a。

附表20：江西都司各衛所軍月糧比較表

	袁州衛歲支月糧/鈔銀/遇閏加銀/閏鈔	贛州衛月糧(閏銀不載)	吉安所月糧(遇閏似不派銀)	安福所月糧/遇閏加銀/屯米	永新所月糧/遇閏加銀	饒州所月糧/遇閏加銀	廣信所月糧/遇閏加銀	鉛山所月糧/遇閏加銀
運糧正軍	3.84/0.051428/0.32/0.0042856	3.2	3.84		3.68/0.32？	3.84/0.32	3.84/0.32	3.84/0.32
操備正軍	同上	3.84	3.84	2.1858/0.1021/若干	3.36/0.28	3.84/0.32	3.84/0.32	3.84/0.32
無妻新軍		2.4						
紀錄軍人		1.44	1.44(幼軍)		1.26/0.525(老幼軍)			

附表20是江西都司各衛所軍行、月糧額的比較。除永新所整體偏低，贛州衛運軍月糧偏低，安福所另支屯米額數不詳，無法比較外，其他衛所不論操軍、運軍，俱都支銀3.84兩。永新所的屯糧供軍比例爲28.88% $-\beta$，在諸衛所中本來就偏低；贛州衛屯糧供軍比例雖高，但府倉收入嚴重不足，相信是影響運軍收入的主要原因。事實上，永新所軍的月糧本爲每月8斗，只因由屯糧支付的部份每斗折銀3分，低於支縣倉米時的每斗4分，以致總額低於其他衛所。贛州衛運軍月糧也有可能是因爲由府倉米支付部份折銀率偏低，以致其總額偏低。永新所的例子也證明了屯糧不足是會影響到軍人收入的，只是袁州衛屯糧不足殃及衛官，永新所屯糧不足卻殃及軍人，顯示明末地方自主性已相當高，各衛所已

能在某種程度上自行調整其官軍俸額。[88]

另外有關行糧銀的記載，僅鉛山所明記爲運官、旗軍每員名支1.5兩，九江衛、廣信所載明運軍行糧例不支閏。其餘衛所除若干特殊軍種有關於行糧的記錄外，有關運軍行糧的部份均失載。運軍行糧應爲統一給付的項目，同一都司內各衛所給付的金額亦應一致，[89]《江西賦役全書》何以缺漏至此？甚難理解。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操軍、運軍月糧有時不在同一地方支領。最顯著的例子是吉安府下各所。按：吉安所運軍月糧係由萬載、清江、新喻、新淦、峽江等縣協濟吉安府倉米銀解司支給，操軍月糧由府支放；安福所運軍月糧由泰和協濟永新倉米改解司銀、永寧協濟永新倉改解安福縣倉米銀及吉水、永豐協濟安福縣倉米銀等解司支放，操軍月糧由縣倉米銀支給；永新所運軍10個月月糧由永新縣府倉米奉文改作協濟永新所倉米、及永新縣協濟安福倉米改存本縣倉米銀解司支放，另2個月月糧由屯糧聽支，操軍月糧則有6個月由屯糧聽支，6個月由縣倉米銀支給。也就是說，操軍月糧分別在三所所在地的府城或縣城內即可支領，運軍月糧卻集中在「使司」支領。「使司」不知何所指，江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俱設在南昌府，但萬曆末年的江西都司恐怕是沒有獨自的收入來源，因此很可能是指布政使司。我們再看《江西賦役全書》中其他衛所運軍月、行糧支領的地點，如九江衛運軍行糧由府倉米銀支給；南昌衛運軍月糧有7個月由府倉米支付，5個月由屯糧支付；袁州衛運軍月糧銀「由府給發，解赴水次」；贛州衛運軍月糧先儘屯糧銀內支用，不足者由府倉米幷南安府屬協濟銀內支用；饒州所運軍月糧先僅屯米支付，不足，由府倉米及府倉麥米支用；廣信所運軍月糧、行糧俱由屯米儘支，不足，由府倉米幷大各祿改抵府倉米銀支用；鉛山所運軍月糧、行糧俱由屯糧正耗米儘支，不足，由鉛山縣倉米幷玉山等縣協濟鉛山縣倉米銀支用等等，基本上似都在衛所所在地發放，只有

---

[88] 不過，衛所官軍俸額的多寡究竟是在都司衛所系統內即可決定？抑或需會同布政司府州縣一同討論決定？仍是值得爭論的課題。

[89] 星斌夫，《明代漕運の研究》（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63），187-89。

袁州衛註明「由府給發，解赴水次」。或許其財源雖由各府縣籌措，但爲確保運軍赴役，特別規定臨運才能領取，因此才有「解赴水次」、「赴使司領糧」等限制產生也未可知。若如此，這項規定應也同時適用於其他衛所，只是資料失載，不見於記錄罷了。

本節最後擬就所謂的「對支法」略做說明。第三節介紹建昌所屯田的改革，其中提到「對支之弊」。按：《諸司職掌》〈戶部・度支科・經費・月糧〉有云：

> 凡內外衛所正伍旗軍歲用糧米，已行各該有司編置勘合對撥，著令人戶自行依期送納外；其在京有未對軍人及未入正伍等項帶支人數，如遇按月支糧，百戶所將所管軍人造冊申繳千戶所，本所類總繳申本衛，該衛類總具解申繳合干上司，轉達本部。磨算相同，明立文案，編給半印勘合字號。仍定奪合於本衛倉某年分、某字廒、某糧米內支給，將文冊繳回原行衙門，轉下該倉，眼同該衛委官及本倉官攢，照數放支。如有事故，扣除還官。支畢，將實支扣除數目申達本部知數，仍於原編字號底簿內，注寫實支扣除數目，以憑稽考。其支過糧數，另於內府糧冊內明白注銷。其在外衛所軍人支糧，亦合一體造冊，編給勘合放支。

顯示旗軍月糧有兩種支領方式。一爲「對撥法」，由納糧「人戶自行依期送納」；另一則爲「按月支糧」，由衛所造冊經兵部稽核後，確定由衛倉某年某廒之某項糧米支用。「對撥法」在北邊軍事地帶曾被廣泛利用，如嘉靖、萬曆間遼東鎮軍糧由北直隸、山東，宣府鎮軍糧由河南、山東、山西、北直隸，大同鎮軍糧由山西、河南，延綏鎮軍糧由陝西、河南人民輸納等都是其例。[90] 但在腹裡地區實施範圍及時間均不詳。建昌所的「對支法」與上述「對撥法」內容上似有不同，主要是指軍人月糧直接由軍屯耕種者處領取，免去屯戶上納後再發給軍人的麻煩。萬曆《建昌府誌》卷二，〈田賦・賦役全書條陳〉推官陸

[90] 寺田隆信，〈民運糧と屯田糧——明代における邊餉問題の一側面（二）〉，《東洋史研究》21.2（1962），收入《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72），28-44。本文所引頁碼爲《山西商人の研究》之頁碼。

鍵的條議中，有關於對支的部分，徵引如下：

> 旗舍軍健在各衙門效勞，自合優異，況相習已久，頓責其執票對支，勢決難行。顧其中無人不承頂數屯，而別籍異名，不可窮詰。試按籍挨户而查，幷查其一一自首；倘自不首，如他人首出，即奪其屯與首實之人，則屯必出矣。以自有之屯，對自支之糧，比執票往別户對支者不同。即官軍中亦有一人而承屯數多者，免其追奪，責其自對名下之俸糧。使已徵之子粒不致缺支，則常年之屯糧可以儘數，而倉米無憂渾淆矣。

同書卷七，〈武備・附推官陸鍵公案節略〉又云：

> 種屯食糧，原是寓兵於農之意。今有一等舍人，種屯不受所官鈐制，往往托勢賴糧。又有一等操運軍人，種屯十餘户或七八户，子弟納吏入泮，投入公門，即以家人食糧伍中，而不當差。印官查點，則張名李替，可恨也。今當嚴行痛革，種屯者不許食糧，食糧者必須發操。至於對支之法，雖曰兩便，然貧軍持票支糧，而種户以強不給，致令受低銀一錢五六分，即作三錢二分月糧之數，爲害不小。今後種屯之家，遇對支勒措短少者，許令受害人告發，奪屯另佃。此其裨軍政者一也。

同書卷二又載陸鍵〈屯田說〉，謂：

> 自種屯不許食糧之法行，而軍始名名著伍；自納粒一概論穀之法行，而屯始粒粒出餉。有力者計無復之，乃積漸逋負，希復對支之舊。此則何可縱也？

陸鍵的這些敘述並無法讓我們瞭解「對支法」自何時開始施行？施行範圍有多廣？但由這些文字勉強可以整理出以下數點：

1、所謂「對支」，是指官軍執票往種戶家（「種屯之家」）支取俸糧。

2、官軍中有一人承頂數屯者，許其自首，免其追奪，應令其以自有之屯，對自支之糧。否則即奪其屯與首實之人。

3、官軍占屯多者，常以子弟投入公門，或托勢賴糧，或食糧而不當差。今後種屯者不許食糧，食糧者必須發操。

4、由於旗軍執票支糧時種戶常恃強勒措，致旗軍不能領足3錢2分月糧之數，今後遇有此種情形，許被害人告發，由官府奪原種戶之屯另行招佃。

按：萬曆間建昌所軍每名月支口糧3錢2分，除正月、二月兩月份糧銀抵作軍

器、淺船料價軍三銀外，無閏年份實支糧十個月，共該支銀1625.6兩；閏月加支一月份，共該支銀1788.16兩。建昌所屯田歲徵籽粒米折徵銀共807.617兩，即全數供作月糧之用，不足者再由建昌府各縣坐派府倉米銀內動支湊給。[91] 這時建昌所的軍屯已大部分由佃戶承種，屯軍多久居府城坐收屯租。所謂以一人承種七八屯或十餘屯，並非親身承種，而是以一人影占數屯，侵有其地。正德間胡世寧建議建昌所正軍除上運者外全數撥與屯田，有屯者即需操練，屯田籽粒不需納官，就准作該關月糧，結果未爲廣昌縣知縣張璨接受。但在張璨最後作成的決議中，仍有部份官軍的月糧是由屯糧直接支給的。這包括了隄備官軍月糧由110戶民戶支付，29名遇例放回屯軍月糧由屯糧中直接支給，以及50名新添在縣防守屯軍月糧由屯田每分減納籽粒支應等都是。這些部份既不必赴所交納，應即是以對支的方式使旗軍直接至種戶家領取。而所謂的種戶便也包括了自種的屯軍、承種的佃戶，以及那110戶「無崙戶」。對支法在萬曆三十七、八年實施自封投櫃法之後是否仍繼續施行，並無明確資料可供查證，但由陸鍵〈公案節略〉所云：「今後種屯之家，遇對支勒捎短少者，許令受害人告發，奪屯另佃」一語來看，大約是與自封投櫃法同時並存的。

江西都司下另一實施過對支法的是袁州衛。康熙《宜春縣志》卷20，〈兵衛・屯田〉謂：

> 明萬曆戊子(1588)，水旱拋荒，屯道行府，扣各軍月糧抵對完屯。屯軍節年援例，名曰對支。在軍爲便，而屯田因之埋沒，後益失考。

袁州衛的對支起因於水旱拋荒，屯田無收。由於屯糧收入本以供衛軍月糧，因此以扣糧方式抵充屯糧。此後耕屯者以此爲便，不再上納屯糧，衛軍月糧改以對支法直接向種戶支領。弊之所及，屯田疏於管理，終至埋沒失考。[92] 袁州衛

---

[91] 萬曆《建昌府誌・武備》7：6a。

[92] 康熙《萬載縣志・武備》5：42b-43a 記有另一種對支，附記於下，以供參考。其文曰：「黎源洞原有坐落屯田七十二户，土曠人稀，軍餘不便管業，多招流民佃種，因而縱其劫財分用，爲患地方不小。議即令該哨官就近管理，約束屯軍。後法久弊生。黎源爲本縣二十四都三圖，向來三百六十餘户，膏腴田產盡爲豪右兼幷，收歸己户。本圖錢糧遂爲奸刁躲糧之藪。崇禎六年，撫院清理兵餉，知縣韋明傑申請將詭户逐名詳查，發回原

行對支法已在萬曆中期，至於江西地區其他衛所是否也有類似的情形？仍不詳待考。不過，據前引《江西賦役全書》，如袁州衛屯糧本色米由屯官徵收府倉，折色米與餘糧銀由屯官徵解府庫，候給各官軍俸月糧；廣信所屯糧由管屯官徵完，運赴廣濟倉上納，支給軍糧；鉛山所屯糧由管屯官徵完，解貯鉛山縣庫支給所軍月糧；永新所操軍、餘丁每年應給屯糧照限解縣，親詣千戶所點名散給等例看來，至少在萬曆末年，以「對支」方式兌領屯糧的例子尚不多見，衛所屯糧的徵收主要仍由管屯官負責。

五、結論

綜合上述，可知弘治十六年的清丈對江西軍屯的發展實有莫大的影響。軍屯的敗壞是導致弘治清丈的主因，可是，清丈的結果更被視爲江西軍屯敗壞的關鍵。這與江西地居腹裡，其軍屯發展受原有土地開發狀況所限，先天已有不足的現實因素有關。江西軍屯肇始於洪武，至永樂而大備。但從初始各衛所屯軍比例就有不能達到八分者。衛軍開墾的荒田許多原是有主之地，承平之後原主復業，軍民間的紛爭便不可免。此外，衛所屯田多與民產相雜，或因位居隔省管理不易，都是促使軍屯敗壞的重要因素。

有關江西軍屯數額的估算，由於明初以來軍政系統與民政系統間相當程度的保守了嚴格的分際，方志作者在資訊缺乏的情況下，收錄的數字往往連自己都不相信。尤其是江西地方經歷弘治十六年的清丈，添設的「新增」一項使熟悉於四柱式黃冊記載方式的州縣官更是莫名其妙。這使得方志中有關屯田數額的記錄格外難解，相形之下，相關數額的推算便也不具太大意義。萬曆會典中江西軍屯原額大於現額，這種現象在全部20個地區中居於少數，但會典所收江西

籍。吊取本圖原額米一千二百五十八石三斗零，實該糧銀七百餘兩，撥兵兌銷。如有籍口荒蕪，不肯兌銷，即聞申上司，著各兵開墾。寓兵於農，使兵無離伍，亦庶幾原初設哨之遺意也。」此法支糧者爲兵而非軍，對支之糧亦不僅屯田而爲全圖之糧，但以本地之糧直接供應本地之兵，不煩官司徵收，其意義與袁州衛、建昌所之對支是完全相同的。

軍屯「原額」究竟代表那個時代已不可考，只能從方志中所反映的實際狀況以及弘治十六年清丈的實施，指出江西軍屯發展趨勢大體上與其他地區無異，永樂以後即一路下滑。弘治清丈只有帳面上的成績，對軍屯的發展並無助益，相反的更深化了軍民衝突。至於萬曆清丈也許在數字上獲得相當成效，但實質上耕種者多爲餘丁、佃戶，萬曆末年如袁州衛軍屯甚至已全數由民戶帶種。

「軍屯民佃」的現象自永樂末年「計屯起運」後已成爲主要趨勢，這使得軍民之間不可避免的會產生許多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受到正統以後長期重文輕武的趨勢影響，尤其是在巡撫成爲固定官名，兼治一方民事與軍務後，都、布、按三司俱成其下屬，久而久之，便爲州縣官製造了介入衛所事務的機會。弘治清丈在欽差科道的主導下，由府州縣官與衛所官併力完成。但當時屯田子粒的徵收仍由衛所負責，州縣官甚難一窺堂奧。隆慶以後由於虛糧擾民，府州縣官開始積極介入軍屯的管理。軍屯中的「絕屯」改由府州縣官召民佃種，給帖爲業，這就侵犯了衛所管屯官的權益。

萬曆以後，越來越多的軍屯改革經由府州縣官之手被推動，起因或在軍佔民田影響地方稅糧收入；或因軍虐民佃引起佃戶抗議，地方官基於保護人民的立場出面干涉。改革的要求常由縣而府向上推行，但因爲江西地區衛所屯田除支應部份衛軍月糧外，更重要的任務在幫助漕運工作的達成，站在漕運第一的立場，上級文官的態度有時就不能和站在第一線面對群眾的縣官一致。贛州府興國縣的虛糧爭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這類實例若能適度累積，當有助於我們對明末社會軍民關係、州縣衛所間互動關係以及地方政府運作方式的瞭解。以區域史研究爲目的爬梳明清方志，應是可行的方向。

另外一點值得一提的是，萬曆三十八年建昌府在清屯的同時甚至還清理了軍伍。萬曆《建昌府誌》卷七，〈武備〉云：

> 操軍原設五百零八名。萬曆三十八年知府鄔鳴雷汰革一百三十一名，見在額設操軍三百七十七名。

知府介入軍務，理由是「該所操軍五百零八名多係影占冒餉」。[93] 這時江西地

[93] 萬曆《建昌府誌・武備》7：8b。

區由於「營兵制」的推行，衛所軍有被編入兵營者，營兵的另一大來源是民兵，民兵的操練由地方官負責，[94] 這也爲地方官製造了過問軍務的機會。地方官參與清軍的問題牽涉到明代軍政系統與民政系統間勢力的消長，筆者將另撰專文檢討。

萬曆間江西各衛所屯糧供軍的比例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八十幾差異極大。除建昌所已改爲自封投櫃的方式，管屯官只許「監收籍記」外；其他各衛所基本上還是維持了由管屯官徵收的局面。徵得的屯糧集中送至府倉或縣倉，領糧軍餘需「親詣千戶所點名散給」。但也有少數衛所採用「對支法」，由衛軍直接向種屯者支領月糧。萬曆間江西衛所軍月糧大致爲每月米8斗，每斗折銀4分，計歲支銀3.84兩。但不論是衛軍月糧或武官俸糧，各衛所並不完全一致，其多寡似乎受屯糧供軍比例以及各地方財政狀況的影響，顯示當時各衛所對官軍俸月糧額似已有某種程度的自主裁量權。萬曆末江西衛所屯糧是否已全數改折徵銀？抑或保有極少部份仍徵本色？衛所官俸糧是否已全數改折支銀？其折銀率如何算出？都是本文未能解決的問題。今後將配合明代江西整體經濟的發展，繼續探討。

（本文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日通過刊登）

---

[94] 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如嘉靖四十四年以後的臨江府即以同知專督團練，見前引文頁1053。

參考書目

一、方志

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明・林庭棉、周廣等纂修，明嘉靖四年刊本，成文780
萬曆《江西省大志》八卷，明・王宗沐纂修，陸萬垓增修，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成文779
雍正《江西通志》一六二卷首三卷，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清雍正十年精刊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13-518
嘉靖《九江府志》十六卷附圖，明・何棐、李泛纂，明嘉靖刊本，天一36、成文735
康熙《九江府志》十八卷，清・江殷道等修，張秉鉉等纂，清康熙十二年刊本，成文736
乾隆《德化縣志》十六卷，清・高植纂修，沈錫三續修，羅爲孝續纂，清乾隆四十五年刊本，成文921
萬曆《彭澤縣志》九卷（存七卷），明・葉朝榮修，戴震亨纂，明萬曆十年刊本，成文860
乾隆《彭澤縣志》十六卷，清・吳會川，何炳奎等纂修，清乾隆二十一年刊本，成文861
萬曆《南昌府志》三十卷，明・范淶修，章潢纂，明萬曆十六年刊本，成文810
正德《袁州府志》十四卷，明・嚴嵩纂，明正德刊本，天一37
嘉靖《袁州府志》十卷，明・陳德文等修，明嘉靖二十二年刊本，天一續49
嘉靖《袁州府志》二十卷，明・嚴嵩原修，李德甫增修，明嘉靖四十年刊本，成文843
乾隆《袁州府志》三十九卷，清・陳廷枚等修，熊日華等纂，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本，成文844
康熙《宜春縣志》二十二卷，清・江爲龍等纂修，清康熙四十七年刊本，成文789
康熙《萬載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清・常維楨等修，姚因校等纂，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成文869、稀見26
嘉靖《贛州府志》十二卷，明・董天錫纂修，明嘉靖刊本，天一38
天啓《贛州府志》二十卷，明・余文龍修，謝詔纂，明天啓元年刊本，成文960
乾隆《贛州府志》四四卷，清・朱扆等修，林有席等纂，清乾隆四十七年刊本，成文961
乾隆《信豐縣志》十六卷，清・游法珠修，楊廷爲等纂，清乾隆十六年刊本，成文805

康熙《瀲水志林》二十六卷，清・張尙瑗撰，清康熙五十年刊本，成文957
康熙《興國縣志》十二卷，清・黃惟桂，王鼎相等纂修，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成文936
萬曆《瑞金縣志》十一卷（存九卷），明・堵奎臨等修，鍾譔等纂，明萬曆三十一年刊本，成文900
康熙《瑞金縣志》十卷附續志十一卷，清・朱維高等纂修，楊以兼等續纂，清康熙二十二年、四十八年刊本，成文901、稀見30
萬曆《吉安府志》三十六卷，明・余之禎、王時槐等纂修，明萬曆十三年刊本，成文768、稀見30
乾隆《吉安府志》七十五卷，清・盧崧等修，朱承煦等纂，清乾隆四十一年原刊本，成文769
嘉靖《南安府志》三十五卷首一卷，明・劉節纂修，明嘉靖十五年刊本，天一續50
康熙《南安府志》二十卷，清・陳奕禧等修，劉文爻等纂，清康熙四十九年刊本，成文808
乾隆《大庾縣志》二十一卷，清・余光璧纂修，清乾隆十三年刊本，成文745、稀見31
康熙《上猶縣志》十卷，清・章振萼修輯，清康熙三十六年刊本，成文740
正德《饒州府志》四卷，明・陳策等纂，明正德六年刊本，天一續44、成文958
康熙《饒州府志》四十卷首一卷，清・黃家遴、佟淮年等纂修，康熙二十二年刊本，成文959
康熙《餘干縣志》十三卷，清・呂璋等修，胡思藻等纂，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成文935
康熙《浮梁縣志》九卷首一卷，清・王臨元纂修，陳淯增修，清康熙十二年刻增修本，稀見26
同治《安仁縣志》三十八卷，清・朱潼等修，徐彥楠等纂，清同治十一年補刊本，成文770
弘治《撫州府志》二十八卷，明・胡企參等修，黎喆纂，明弘治十五年刊本，天一續47-48
康熙《撫州府志》三十六卷，清・曾大升等纂修，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本，成文927
康熙《臨川縣志》三十卷，清・胡亦堂等修，謝元鍾等纂，清康熙十九年刊本，成文944
正德《建昌府志》十九卷，明・夏良勝纂，明正德刊本，天一34
萬曆《建昌府誌》十五卷，明・鄔鳴雷、趙元吉等纂修，明萬曆四十一年刊本，成文829
乾隆《建昌府志》六十五卷，清・孟昭等修，黃祐等纂，清乾隆二十四年刊本，成文830
康熙《廣昌縣志》六卷，清・王景升等修，魏宗衡等纂，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成文916
同治《廣昌縣志》十一卷，清・曾毓璋纂修，清同治六年刊本，成文917

嘉靖《廣信府志》二十卷，明・張士鎬修，江汝璧纂，明嘉靖五年刊本，天一續45
康熙《廣信府志》二十卷，清・孫世昌纂修，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稀見28、成文918
萬曆《池州府志》十卷，明・李思恭等修，丁紹軾等纂，明萬曆四十年刊本，成文635
乾隆《東流縣志》二十七卷，清・蔣綬修，汪思迥纂，清乾隆二十三年刊本，成文608
乾隆《建德縣志》八卷，清・許起鳳纂修，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成文656
道光《建德縣志》二十一卷，清・陳葵等修，管森等纂，清道光五年刊本，成文657
*稀見：《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北京：中國書店，1992。
*天一：《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1964。
*天一續：《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
*成文：《中國方志叢書》，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二、其他

于志嘉，〈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4（1986）：635-67。
于志嘉，〈試論明代衛軍原籍與衛所分配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2（1989）：367-450。
于志嘉，〈明代軍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2，515-40。
于志嘉，〈再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幾個個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1993）：639-78。
于志嘉，〈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1（1993）：135-74。
于志嘉，〈明代江西兵制的演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4（1995）：995-1074。
于志嘉，〈幫丁をめぐって——明代の軍戶において——〉，《西嶋定生博士頌壽記念論文集・東アジア史の展開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印刷中。
川越泰博，〈『大明會典』にみえる明代衛所官の月糧額をめぐって〉，《汲古》15（1989）：37-42。
不著編人，《江西賦役全書》不分卷，《明代史籍彙刊》25，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據明萬曆三十九年江西布政司刊本影印，1970。

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三十卷目錄一卷，東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間福建巡撫劉良弼校刊本，萬曆二年序。傅斯年圖書館藏紙燒本。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

全漢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新亞學報》8.1（1967）：157-86。

寺田隆信，〈民運糧と屯田糧——明代における邊餉問題の一側面（二）〉，《東洋史研究》21.2（1962），收入《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72。本文所引頁碼爲《山西商人の研究》之頁碼。

李東陽等奉敕撰，正德《大明會典》一八〇卷，東京：汲古書院，據東京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本影印，山根幸夫解題，1989。

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萬曆《大明會典》二二八卷，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據萬曆十五年刊本影印，1976。

李賢等奉敕撰，《大明一統志》九十卷，台北：文海出版社，據中央圖書館藏清初本影印，1965。

吳　晗，〈明代的軍兵〉，《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5.2（1937），收入《讀史劄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本文所引頁碼爲《讀史劄記》之頁碼。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松本隆晴，〈明代屯田子粒統計の再吟味——永樂年間を中心にして〉，《史滴》3（1982）：44-63。

茅元儀，《武備志》二四〇卷，台北：華世出版社，據天啓元年刊本影印，1984。

星斌夫，《明代漕運の研究》，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63。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十卷遺稿一卷年譜一卷，《四部備要・集部》2128-130，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1936。

海　瑞，《海瑞集》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

清水泰次，〈明代の軍屯〉，《東亞經濟研究》8.2（1924），收入《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大安，1968。本文所引頁碼爲《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之頁碼。

清高宗敕撰，欽定《續文獻通考》二五〇卷，清乾隆十二年奉敕撰，四十九年恭校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局，據清光緒間浙江刊本縮印，1987。

郭松義，〈清朝政府對明軍屯田的處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會科學輯刊》4（1986）：45-53。

張廷玉等撰，《明史》三三二卷，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1975。

張海瀛，《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張德信、林金樹，〈明初軍屯數額的歷史考察——與顧誠同志商榷〉，《中國社會科學》5（1987）：187-206。
張學顏等，《萬曆會計錄》四三卷缺卷六，《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52-53，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十年刻本縮印，1988-。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上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75，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
楢木野宣，〈衛所の行方〉，《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論集》3（1954），收入《清代重要職官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75。本文所引頁碼爲《清代重要職官の研究》之頁碼。
翟　善，《諸司職掌》十卷，《玄覽堂叢書》初輯12-13，台北：正中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刊本影印，1981。
潘季馴，《督撫江西奏疏》四卷，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六年豫章郡守王氏編刊。傅斯年圖書館藏縮微膠片。
賴建誠，〈《萬曆會計錄》初探〉，《漢學研究》12.2（1994）：137-56。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二〇卷，台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成都敷文閣排印本。
顧　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4（1986）：193-213。
顧　誠，〈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1988）：15-22。

Military Colonies of the Chiang-hsi Garrison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Yue Chih-chi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Previous studies of Ming military colonies have suggested that by the Hung-chih period(1488-1506) military colonies across the country had generally lost half of the acreage allotted to them in the early Ming, and that the original acreage was not restored until the land survey of the Wan-li reign (1573-1620). The original acreage of the military colonies in Chiang-hsi listed in the *Ta Ming hui-tien* (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Great Ming) is larger than the contemporary acreage. But exactly which periods do these two figures in the Collected Statutes represent? How did the changes in the military colonies in Chiang-hsi differ from those in other region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relying on the *Wan-li k'uai-chi lu* (Financial Statistics of the Wan-li Period), the *Chiang-hsi fu-i ch'üan -shu* (Comprehensive Statutes of the Chiang-hsi Taxation & Corvée), and relevant data in a variety of local gazetteers. It shows that the 1503 land survey of the Chiang-chi's military colonies was a turning point leading to the continual deterioration of the military colonies thereafter. The "newly added" (*hsin cheng*) category, established after the survey, deepen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the common people. Furthermore, the increase of "employing civil tenants to farm military colonies" inevitably led to a number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ilitary and commoners. After 1567, when disturbances arose among people who still had to pay their land taxes after their land was taken away by the military, local officials began actively interfering with garrison affairs. After 1573,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ilitary colonies underwent reform at the initiative of local officials. Wherea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military colonies of the Chiang-hsi garrisons could smoothly perform their duties of transporting grain to the capital, the attitudes of top-level civil officials often differed from those of the low-level officials who

had to confront the common people. The present study cites concrete examples to lay out the conflict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garrisons and civil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between top-level civil officials and bottom-rung local officials. It also elabo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ply ratio of the Chiang-hsi garrisons to the military and the amount of grain paid in salary to military personnel during the Wan-li period.